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3月30日第66期

本期目录

热点研究

陈闯创 [是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吗？——兼谈宋彬彬的道歉](#)

书海泛舟

何 蜀 [真情真史在民间——陈懋智《浮生杂记》序](#)

陈仁德 [沉甸甸的历史——先父遗著《浮生杂记》序](#)

陈懋智 原著 陈仁德 整理 [《浮生杂记》目录](#)

陈懋智 原著 陈仁德 整理 [儿子储德的遭遇（《浮生杂记》选读）](#)

谢声显 [那山那人——《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序](#)

陈仁德 [纪念那些逝去的岁月——《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自序](#)

陈仁德 [《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目录](#)

陈仁德 [荒唐往事二则（《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选读）](#)

陆文光 [《文革词汇》前言](#)

生逢乱世

湖滨散人 [“学农”：文革时期学生的必修课](#)

张维武 [串联路上的“大雁”，你在哪里？——来自海外的“寻人启事”](#)

忆旧思亲

何 蜀 [师友从今少一人——痛悼杨世元老师](#)

故纸堆

杨世元 提供 何蜀 录入、注释 [“工农兵”批判罗广斌——1967年3月重庆市文联几次会议记录](#)

编读往来

[庄菁瑞谈李海文笔下的张春桥](#)

[舒云、余汝信谈“直升机”与“直升飞机”](#)

是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吗？

——兼谈宋彬彬的道歉¹

陈闯创

《昨天》编者按：本文已选入天问联合学会即将出版的《红祸——文革发动五十周年论文集》。本刊发表时对第三部分略有删节。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以下简称“女附中”）高一3班部分学生（以中共干部之女为主）批判殴打该校5位领导，校内外的其他学生也陆续参与进来。在被侮辱殴打折磨数小时后，该校中共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遇难，被后人称为北京“八五”事件。在文革中死于学生之手的教育界总人数至今无法统计，卞仲耘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政治贱民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死或自杀的事件司空见惯，也很少有人会因此承担责任。22年后的1988年，女附中原高一3班学生王友琴作为“八五”事件亲历者首次披露了这件事²。在随后的调查中，王友琴提供了很多卞仲耘遇难案的细节，但其中并不包括她那些作为该案肇始者的同班同学的名字，她的校友宋彬彬（女附中原高三3班学生）却成为她对此案记录的中心人物：王指控是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而宋彬彬是该校红卫兵领袖，并且宋因为在1966年8月18日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以及被毛泽东赐名“要武”而成为红卫兵最知名的代表³。

刘进等多位女附中校友在2002年后开始合作调查“八五”事件，宋彬彬后来也加入其中，调查结果于2010年4月首度部分公开⁴。2012年1月宋彬彬发表文章具体谈到自己与“八五”事件的关系，并在文中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道歉

¹ 华新民、何蜀、杨隼为本文的修改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章存在的问题由笔者负责。

² 王友琴《女性的野蛮》，见《女博士生校园随笔》，北京出版社，1988年9月。时至今日，王友琴仍在坚持调查文革遇难者的情况，并于2000年和李晓林等人合作建起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这个纪念园已是研究文革遇难者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

³ 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38.html> 爱思想网，2005年1月10日。

⁴ 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¹，2014年1月12日宋和刘进等人回到母校就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道歉²。刘进、宋彬彬的调查结果和道歉虽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八五”事件，但她们始终回避“八五”事件真凶的问题。王晶焄在2014年1月27日签署声明，表示在真相大白前绝不接受宋彬彬、刘进的虚伪道歉。宋彬彬在2012年还发表《王友琴加于我的历史耻辱架》，这实在是夸大了王友琴的作用，真正把宋钉在耻辱架上的是靠暴力和欺骗发动文革并持续掩盖真相的毛泽东和中共。

卞仲耘遇难事件的真相至今未得到完全公开，争议的焦点主要汇集到以下五个问题：1.事件的策划人和发起者是谁？2.打人者是谁？3.卞何时遇难以及是否有人抢救卞仲耘？4.女附中当时的掌权者是谁以及有多大的权威，在此案中应承担多少责任？5.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此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对于前4个问题，笔者没有答案，期盼当事人或研究者能提供和发掘更详细的资料。但第5个即关于红卫兵的问题，笔者认为现有资料已经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只是很多人还不愿意接受：截至卞仲耘遇难时，北师大女附中还未成立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即8月5日打死卞仲耘的女附中学生当时还不是红卫兵（按：下文中凡是提到的日期如未标明年份，即默认为1966年）。

考虑到关于红卫兵运动初期情况的说法谬种流传，笔者将先澄清红卫兵运动初期的若干重要问题，然后再具体谈及北师大女附中的情况，最后讨论一下宋彬彬的道歉的问题。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完全赞同去追究在卞仲耘遇难事件及类似暴力事件中凶手及相关人物的责任，但责任大小应取决于其涉案程度，而与其个人身份无关，不管是共产党员、红卫兵还是一般群众。也就是说，没有行凶的红卫兵就不应该承担行凶的责任，而行凶的即便不是红卫兵也应为此担责。正如印红标所说：“不论是群众自发的暴行，还是红卫兵成员的暴行都应当谴责。”“在叙事的时候应当尽量准确，不必让红卫兵为所有的暴行负责，例如令人发指的北京大兴县农村的灭门暴行，就不是学校红卫兵所为。”³

从现有材料看，制造北京“八五”事件的师大女附中凶手们当时还不是红卫兵，承认这一点并没有减轻甚至有可能增加她们的罪恶程度：这种无需组织即可随意实施的暴力比有组织暴力更加难以预测，而施暴者不会为此受罚甚至还会被奖赏就使得这种暴力更具有威慑性。另外，红卫兵犯下的暴行数不胜数，承认北

¹ 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记忆》总第80期，2012年1月31日。

² 《师大女附中“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发言》，《记忆》总第108期，2014年2月15日。

³ 《编读往来》，《记忆》总第48期，2010年5月15日。

京“八五”事件不是红卫兵实施的也绝不会减轻红卫兵的罪恶。在1966年8月下旬开始的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活动中，十几天内至少有上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单此一件事就足以将红卫兵（尤其是老红卫兵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¹；其次，有理由相信，在8月7日女附中成立红卫兵时，那些两天前殴打卞仲耘致死的女附中学生（尤其是干部之女）基本都会加入进来，而绝不会因此被拒绝加入（见下文）。

笔者在《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一文中说1966年8月前中国并没有红卫兵运动，当时仅在北京十几到几十所学校（几乎全是高中）里存在着名叫“红卫兵”的学生团体，另外还有极少数学校里有“红旗”、“东风”等类似的团体²。将这些团体统称为“红卫兵”组织是不恰当的，他们彼此之间既无联系，而且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驾齐驱甚至名头更响亮，而“红卫兵”不过是众多自发学生团体中的一个而已。

这些小团体一般以高干子女为主，人数很少，虽然在6月份有过一些激进的活动，但到7月下旬时几乎就要被一贯压制独立团体的中共所镇压或融化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13日开会讨论北京中学文化革命时就说：“搞秘密团体都不要，地下活动是错误的。”³众所周知，直到得到毛泽东8月1日和8月18日两次的大力支持和扶植后，红卫兵运动才先后于北京和全国范围内兴起，但有若干细节尚未引起人们广泛注意。

1. 1966年7月下旬，回到北京不久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现状非常不满，并将此归罪于派到各单位主持运动的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虽然工作组是刘少奇等中共官僚按照以往政治运动惯例而派出的，毛泽东仍要求撤销工作组。因此，原本即将被工作组压垮的北大附中红旗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分别在7月25日和7月27日得到了转机，到7月29日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时，红旗和红卫兵之前所承受的来自工作组的压力就完全消失了，各自的革命左派地位进一步得到了认定。在这个过程中北大附中红旗及其代表彭小蒙多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批评工作组，名气大增。

2. 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最早直接来自毛泽东的支持是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毛于7月31日写出此信并批给下属阅读，但最终并未发

¹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香港《中国研究》，1996年秋季号，第2期。

² 陈闯《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昨天》第48期，2015年3月30日；原载于吴称谋主编《历史期待拐点——重审文革与探索未来》，纽约：中国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年3月。至今没有资料完整列出1966年8月前在北京到底有哪些中学存在名叫“红卫兵”的团体以及每个团体究竟有多少成员。现在只知道有一所大学在8月前就已有红卫兵，是成立于6月18日的北京矿业学院红卫兵，见方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华夏文摘增刊第654期，2008年6月23日。就连北京市东城区也直到1966年7月下旬才出现了红卫兵组织，见《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大事记》1997年版。

³ 《刘少奇、邓小平6、7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6年（第二版）。

出。8月1日毛将该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8月2日信件即从参加会议的北京军区司令杨勇处传出并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头目宋柏林得悉¹。8月3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王铭、卜大华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信，8月1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骆小海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问起此信，毛说只是草稿还没发呢。不过这封信仍然通过高干子女等渠道快速传播开来，在北京迅速出现各种仿效“红卫兵”和“红旗战斗小组”的所谓自发组织，但截至8月18日在北京以外只有极少数大城市零星出现了由消息灵通的高干子女成立的红卫兵组织。

3. 北大附中红旗和彭小蒙的突出地位。正因为红卫兵后来的巨大名声，反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及其代表人物彭小蒙在1966年7月下旬到8月18日之间其实比清华附中“红卫兵”更早、更多得到官方支持以及名声更大。宋柏林就在7月27日的日记中提到“看来彭小蒙尾巴翘太高了，把各校左派的兄弟关系看成老子、小子关系”。

因为反工作组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在7月下旬连续抛头露面，7月25日、26日连续两晚中央文革在北大召开群众大会，彭小蒙上台发言批判北大工作组及组长张承先，7月27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革命师生代表大会，彭小蒙发言介绍江青在北大讲话内容，7·28在北京展览馆开会批判工作组，彭小蒙仍然上台发言，而直到这次会议清华附中“红卫兵”两篇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才得以交给江青并转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中却同时点名支持了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和彭小蒙，这就足以说明“红旗”通过江青已经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月4日彭小蒙在北大全校大会上殴打张承先²。

8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8月10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无往而不胜》，署名为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8月18日彭小蒙代表中学生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即毛泽东接见群众大会）上讲话。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直到8月19日才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正是这篇报道才一举奠定了红卫兵一统江湖的地位，文中提到毛泽东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并引用康生的话说“毛主席也参加红卫兵了”。不过这篇报道同时还赞扬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以敢于冲锋陷阵闻名的战斗组织”。

另外，文革中最早出现最为知名的群众歌曲《革命造反歌》就是北大附中“红

¹ 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6月。

² 以上关于彭小蒙的内容，参见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卜伟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关于彭小蒙当众打张承先的时间存在争议，笔者选取8月4日的说法，见谢定国《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华夏文摘增刊第955期，2014年8月18日）和《北京大学1966大事记》（《记忆》总第114期，2014年5月31日），但大事记上未提到彭的名字。

旗”在6月初创作、7月1日定稿的，歌词中的“革命师生齐造反”使这首歌成为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鼓吹造反的两篇文献之一¹（另外一篇就是1966年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事实上，正是因为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巨大名气，后来大名鼎鼎的北航“红旗战斗队”于8月20日成立时都是仿效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取名的²。（下图：在“八一八”大会上，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作为革命师生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言。）

4. 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但尚无证据表明在8月18日前毛及中央文革小组就已决心支持推广“红卫兵”或“红旗”的组织形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8日通过了由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这一文革纲领性文件中只是抽象地赞扬“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没有提到“红卫兵”或“红旗”，却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王年一说这次会议上没有任何肯定红卫兵并表示，参会的上海市长曹荻秋甚至在八一八大会过后仍然反对上海建立除“文化革命委员会（小组）”以外的组织，比如红卫兵，曹说“我们只搞文化革命的组织，组织红卫兵的问题还要考虑，我们不提倡，（中共）8届11中全会上没有讲”³。



5. 毛泽东8月1日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流传开后，北京出现了众多自发学生组织，开始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红卫兵将成为这些组织的统一名称，他们当时还只是习惯性的统称自己是左派。甚至在8月18日大会后当晚，有学生向周恩来提问中央能否就统一组织做出具体办法时，周还提议把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组织统称为赤卫队比较好⁴。需要说明的是，1966年8月18日大会并

¹ 《迷狂的音符》，选自秦晓鹰《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文中说歌曲是依据6月4日阎恒《文化革命干一场》快板诗改编的，7月1日改名为《造反歌》，原稿中似无“造反”字样。

² 石兴国《北航红旗诞生》，http://blog.sina.com.cn/s/blog_da99d3a80101nirc.html 新浪博客2013年8月20日。

³ 王年一《文革漫谈》（删节版），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派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年11月，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⁴ 1966年8月18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不是“毛主席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大会”，到场红卫兵仅有几万人而已。红卫兵在八一八大会上登上政治舞台，毛泽东在会上戴上了宋彬彬送上的“红卫兵”袖章，会后中共舆论机关极力宣扬，红卫兵的名称才得以席卷天下。

实际上8月18日以后各单位出现的首批红卫兵组织往往是由地方当局顺势授意或包办建立的，以应对、引领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这批8、9月期间成立的官办红卫兵一般是保守派，和稍后10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是有明显区别的。比较常见的是，官办的红卫兵直接以“××单位红卫兵”命名（也就是所谓的“三字兵”，因为只有“红卫兵”这三个字），造反派红卫兵为突出与官办红卫兵区别，往往以“××单位毛泽东主义（思想）红卫兵”命名（也就是所谓的“思想兵”或“主义兵”）。比如清华大学8月20日出现的第一个“清华大学红卫兵”就是由原工作组扶植的贺鹏飞为首成立的，8月22日出现的“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是由主张批判工作组的学生发起成立的¹。当然文革期间各地形势千差万别，总有例外，比如广州市官方最早扶植的红卫兵就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重庆官方先建立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又组建“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不久又将两个总部合并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²。

6. 毫无疑问，毛泽东既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也是其终结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大附中“红旗”和清华附中“红卫兵”自发成立近两个月后，毛泽东才通过江青发现了“红卫兵”和“红旗”；并且显然是出于推动文革的政治算计，毛泽东表示热烈的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和行为，从而形成了“红卫兵运动”。这个时间差足以说明毛泽东不是算无遗策在筹划文革伊始就决意借用青少年学生作为推动文革的主要力量，支持红卫兵和批准大串联等等都不过是毛面对局势自然发展时做出的应对策略，至于其结果自然是毛也无法完全预计和控制的。1966年10月下旬，毛泽东就说：“我也没有料到，（北大）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³

二、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之死与红卫兵

现有材料说明北师大女附中在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时尚无以“红

¹ 《清华大学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

² 一听《广州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华夏文摘增刊第271期，2001年10月22日；何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华夏文摘增刊第316期，2002年12月2日。

³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卫兵”命名的组织，只有一个叫“红旗”的少数派激进团体，而发起批斗卞仲耘的学生所持观点是和“红旗”对立的。直到8月7日，女附中才成立了“红卫兵”。

李红云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从一份原始记录说起》中说：文革期间，女附中曾出现过两个红卫兵组织，即“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红卫兵”。“红旗”正式宣布成立于1966年7月31日，由反工作组的部分学生组成。“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7日¹。

李红云的文献来源分别是北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会议的原始记录（简称“记录”）和《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6.6.1—10.3）》（简称“大事记”）大字报手抄件，笔者认为她的考证结论是正确的，但不同意她把最早期的“红旗”也称作红卫兵组织。“记录”中清楚记载了8月7日成立红卫兵，无可辩驳。考证的难点在于如何理解“大事记”中的如下记载：7月31日，校内成立了“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这句话能否说明女附中学生在7月31日同时成立了“红旗”和“红卫兵”两个团体，或者说“红旗”就是“红卫兵”？

根据女附中文革的展开情况，结合本文第一节所述红卫兵运动的北京，笔者认为女附中“红旗”和“红卫兵”在成立之初是两个观点不同甚至相反的组织。激进的少数原反工作组派率先成立了“红旗”，而原支持工作组的保守派成立“红卫兵”在后，“红旗”后来既为顺应形势又为显示独立性被动改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具体情况如下：

驻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于7月30日撤出该校并宣布“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反工作组的学生梁二同等人次日即7月31日就宣布成立“红旗”。此前梁二同等人因反工作组在校内受到打压，就很少在校内活动，主要是在校外串联，她们已经同海淀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建立联系²，但在7月31日她们选择以“红旗”而非“红卫兵”为自己的组织命名，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大力支持的北大附中“红旗”风头正盛，远超清华附中“红卫兵”，而不代表梁二同等人不认同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精神。

8月7日原工作组扶植的“学生会”和“革委会”负责人刘进、宋彬彬决定成立“红卫兵”，这并不能说明她们接受清华附中“红卫兵”所主张的造反精神，而很可能只是她们作为高干之女已经得知毛泽东6天前表示的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的大力支持，既然反工作组的学生已经成立“红旗”，她们自然只好选用“红卫兵”为自己的团体冠名。在卞仲耘遇难两天后她们就以学校掌权者的身份决定成立“红卫兵”，并且准备接受所有愿意加入进来

¹ 李红云《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记忆》总第102期，2013年9月30日。

² 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的红五类，这就说明她们一方面是想稳定工作组撤离后出现的乱局，另一方面对于打死卞仲耘的红五类则毫无排斥。她们甚至还想吸纳作为对立面的“红旗”加入到“红卫兵”来，但事后的发展表明女附中“红旗”拒绝被“红卫兵”所吸纳¹。到了8月18日毛泽东接受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戴上红卫兵袖章，大势所趋之下，保持少数派的女附中“红旗”只好改名，但像很多组织一样，为显示同官办红卫兵的区别，表明更加激进的姿态，她们改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需要补充的是，虽然多名女附中校友陶洛诵、邓榕、张敏、冯敬兰、刘进曾说过1966年7月份时女附中就出现了红卫兵，这不足以否定李红云的考证。原因很简单，李红云是依据原始文献进行的考证，而人们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情时往往发生时间错位。比如金大陆曾考证文革期间上海有无肉票，30个人仅1人正确的回忆没有，这还是十年范围内的误差²，而关于红卫兵成立的回忆时间误差仅是几天，就更有理由怀疑这些人的回忆精准度。更何况，笔者在《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一文中说过，受中共故意误导和掩盖真相所致，绝大多数人早已习惯性地谈论红卫兵、造反派时犯下时空错位的错误。就像南京八三事件中江苏教育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范学院中共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在学生批斗中死亡一事，南师校史竟然记录称是红卫兵打死吴、李夫妇，这纯属无知，当时南师根本不可能有红卫兵，卞伟华就对此记载提出批评，这种时空错位实在是太多了³。

考证了8月5日女附中只有“红旗”而尚无“红卫兵”组织后，需要进一步了解“红旗”在卞仲耘遇难一事上承担何种角色。“红旗”是反工作组的高三学生成立的，而无论是王友琴1988年的文章还是2010年刘进等人公开的调查结果，都指认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在工作组撤离后为摆脱原来因支持工作组而陷入的困境，要显示自己的革命精神而发起揪斗“黑帮”（即已被公开批判的校领导卞仲耘等人）的，打人的主要就是高一和初二的学生。而反工作组的高三学生事发时曾劝说斗“黑帮”不要体罚打人，事发后第二天则调查事情经过⁴。这足以说明持反工作组立场的少数派学生组织“红旗”与卞仲耘遇难事件无关。事实上，五十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任何人指责过女附中“红旗”应为卞仲耘遇难负责⁵。

当然，殴打卞仲耘的学生中还有少数毕业于女附中初中后就读于其他高中的学生，比如迄今为止唯一被披露姓名的凶手刘南南，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她在打人

¹ 李红云《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记忆》总第102期，2013年9月30日。

² 启之《关于文革研究的新思路——金大陆教授访谈录》，《记忆》总第79期，2011年12月30日。

³ 卞伟华《把史实搞清楚是最重要的》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j/ljsj/article_20140207100033.html 共识网2014年2月7日。

⁴ 王友琴《女性的野蛮》，1988年；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⁵ 不过师大女附中“红旗”和“红卫兵”同为高干之女组成的老红卫兵，到校外打击平民子女造反派的做派差别不大。“红旗”的梁二同8月24日参加了臭名昭著的清华红色恐怖“八二四事件”，而“红卫兵”的邓榕则参加了9月6日西纠与地质学院东方红在地质部的冲突。见许爱晶《清华蒯大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王大宾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时是否具有红卫兵的身份。所以，现在还不能就红卫兵是否打死了卞仲耘做最终结论，但可以断言：对卞仲耘行凶的女附中学生当时并不是红卫兵，她们是以群众的身份为满足个人的政治私欲而公开实行了一次私刑。比起红卫兵的有组织暴力，这种非组织的群众暴力的恐怖性并没有逊色多少，甚至更可怕。

那么，为何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李红云文章发表两年来，绝大多数人仍然习惯性地就把北京“八五”事件的责任归到红卫兵身上呢？

首先，当然是中共压制对文革的研究，邓小平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限制，以及为避免对文革罪魁毛泽东的否定，引导人们简单化地把一切罪恶都归到“红卫兵”和“造反派”身上。只是因为“八五”事件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才有人会为此专门寻找史料，时隔40余年才重见天日。另外，红卫兵在“八一八”后给人的印象太深，完全压过了北大附中“红旗”的风头，人们不知道此前实际是彭小蒙代表的北大附中“红旗”更有名，不容易相信北师大女附中是先成立了名为“红旗”的组织，而后才出现了名为“红卫兵”的组织，而这两个组织在女附中实际上是观点对立的。

其次，北京“八五”事件与三周后红卫兵实施的“红八月”恐怖时间上很近，使得人们易于产生两者相关的联系。实际上北京“八五”事件并非仅有的一起学生打老师事件，在其之前和之后多个地方均有发生，其主要原因和工作组而非红卫兵有关。工作组撤离学校前后，原来支持工作组的学生（一般称为“保守派”，当然也有特例）为体现自身的“革命”，摆脱了工作组原来施加的限制所谓“乱斗”，自行揪斗原本即已被抛出的批判对象，在多个地方都发生了此类事件并有人伤亡，比如南京师范学院“八三”事件及其他南京高校的类似行为，北京四中8月4日学生大规模斗老师，江西师大8月11日原支持工作组一派批斗“黑帮”导致三人死亡一人自杀，上海多所高校8月初“斗鬼风”等等。限于篇幅限制，笔者将另文专论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与暴力问题。

三、宋彬彬的道歉

在读到宋彬彬和刘进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时，我就感觉她们两人的悔改之心是真诚的，但我怀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不会接受她们的道歉。果不其然，王晶垚不久就发表声明，称：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¹王晶垚知道宋彬彬没有参与殴打卞仲耘，他所要求的真相至少应包括卞仲耘案凶手的姓名。很遗憾，虽然刘进牵头、宋彬彬参与的为期8年的调查已经得到了众多行凶者的姓名信息，但正如王冀豫评论

¹ 王晶垚《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纵览中国网站，2014年1月29日

的那样，“女附中最大的失败，就是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出打死校长的那些人是谁。”

1

宋彬彬曾为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道歉，这是她个人选择，但道歉理由有些牵强。首先从当时中国宪法第 87 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角度来说，她作为学生写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的治校方针并无不可。更何况刘进和宋彬彬之所以在 6 月 2 日发表大字报，完全是为了响应中共舆论机关（奉毛泽东的命令）播发北大聂元梓等人批判北大校长等人的大字报，以当时形势而言，没有宋彬彬这张大字报，也肯定会有别人迅速响应贴出大字报。所以宋彬彬说因为她们的大字报而破坏了学校正常秩序，实在是言过其实，承担了不该由她承担的责任。

宋彬彬要不要为组建女附中红卫兵道歉？如果从宪法 87 条所规定的结社自由的角度来说，她当然有权成立各种组织。关键是成立组织后她们做了什么事情。另外，如果红卫兵确实是一个自发群众团体，那么她们限定“红五类”才能加入也无不可。但问题是当时其他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无权成立什么“黑卫兵”、“灰卫兵”之类的组织，也就说明所谓结社自由显然是虚假的。她若为自己当年盲从上级、没有辨别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道歉是可以的，但还应追究为何没有这种能力。

那么宋彬彬应该如何道歉呢？1966 年 8 月间所发生的卞仲耘之死、毛泽东令其“要武”、北京红卫兵十数天内活活打死上千人（即所谓“红八月”）这三件事，令宋彬彬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这三件事都与当局煽动、放纵、利用暴力有紧密关系。更由于当局一贯扭曲、掩盖文革事实，人们迄今不明这些暴力事件的真相，宋彬彬也就无法彻底澄清自己、摆脱耻辱。对宋彬彬来说，仅有真诚的悔改态度是不够的，除非她能像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那样独立思考和批评父辈所作所为²，直接批评共产党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本质，否则她就不可能真正从历史耻辱架上走下来，而只能作为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及其体制的牺牲品被历史记住。

据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北京“八五”事件和所谓“红八月”期间她都没有参与行凶，甚至在“红八月”后期还跑到湖北去了。既然如此，在这两个问题上，宋彬彬想要摆脱耻辱并不困难，她所需要做的就是讲出她知道的事件真相，并就拖延讲出真相而道歉。作为当时的师大女附中学生领袖之一，宋彬彬至少是知道部分卞仲耘案凶手的姓名的。除此之外，她还应该正面回应卞仲耘家属的疑问。

真正困难的是，宋彬彬如何面对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要求她“要武”的毛泽东，毛泽东及其体制才是真正将她拉上耻辱架并且下不来的罪魁祸首。数十年来

¹冯翔《王晶珪：“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 年 3 月 13 日。

²王友琴《李讷、林豆豆、宋彬彬》，香港《开放》2012 年 2 月号。

宋既不指出卞案凶手姓名，也不批评把她带上耻辱架的毛泽东，她现有的道歉确实不足以下耻辱架。那么为何数十年来宋彬彬都不能澄清她在卞仲耘案和“红八月”期间并未犯有暴行？

首先当然是中共将文革视为最大的历史负资产之一，尽可能地压制一切关于文革的独立研究，扭曲历史事实、封锁真相，以至于人们普遍缺乏对文革的客观认识。在真相被压制、论述不自由的情况下，人们的看法很容易受到官方的误导，好似文革中除了红卫兵、造反派、林彪和“四人帮”之外就没有别人做过坏事。无怪乎宋彬彬道歉一出，一般民众甚至以为宋在撒谎，而几位有名的文革学者却都能接受宋的说法至少是真实的。

其次是因为卞仲耘案和“红八月”事件中的真凶都牵涉到高干子女，所以中共不愿意追究责任。实际上中共高层的一些决策者在文革后出于复仇的动机发起了一场“清理三种人运动”，其中就包括要清理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等，但是当清算进行到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犯下的暴行时就无法进行下去了。1984年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之子孔丹向中共二号人物陈云上书表示老红卫兵与造反派有本质区别，陈云同意说“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陈的意见得到中共一号人物邓小平和总书记胡耀邦的支持，中共正式发文制止了对老红卫兵的清算，而这直接影响到了卞仲耘案和其他文革期间北京中小学命案的调查¹。既然真相不明，宋彬彬自然不能洗脱身上的罪名。

宋彬彬要摆脱8月18日毛泽东对她说“要武”的耻辱，仅靠轻飘飘地说一句自己从未使用过“宋要武”名称是不够的。即便这是事实，即便“要武”是毛讲的玩笑话，但这句话经官方媒体炒作后造成的实际恶果是无法否认的，“宋要武”成为红卫兵暴力的标志性符号。正如叶志江所说：“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恐怕并不完全在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上所负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彬彬或宋要武已成为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政治符号，就像蒯大富成为红卫兵运动后期的政治符号一样。蒯大富已用十七年的牢狱生涯来偿还他的债务，宋彬彬等人又该如何偿还他们的债务呢？”²虽然“宋要武”未杀人越货，但其他各类的“要武”者在文革后未受到中共真正的清算（只清理某一派的事情是有的），宋彬彬就只有批评中共对“要武”的态度，才能摆脱“宋要武”给她带来的耻辱。

正是爱好和迷信暴力的毛泽东及其体制给宋彬彬加上了“宋要武”这个暴力符号，又通过蒙昧和限制言论自由来掩盖真相，维护统治，使得宋彬彬数十年来没有机会澄清她是被强加上“宋要武”符号的。

除非宋彬彬直接批评强加给她“宋要武”符号的毛泽东及其体制，她终将只

¹华新民《卞仲耘命案争论拾遗》，华夏文摘增刊第956期，2014年8月19日。

²叶志江《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2010年5月25日。

能成为牺牲品，这也就是为何徐贲说为文革过错道歉必须包括“极权帮凶”罪¹。

草稿：2014. 2. 20

完稿：2016. 2. 4

【书海泛舟】

真情真史在民间 ——陈懋智《浮生杂记》序

何 蜀

《昨天》编者按：陈懋智原著、陈仁德整理的《浮生杂记》一书，已于2016年1月自印出版。

最先读到的陈仁德兄之父陈懋智老人的遗著，是《重庆武斗日记》。尽管研究重庆文革武斗多年，搜集、阅读过不少有关的史料，仍为老人日记中那些从武斗战火殃及的无辜平民角度所做的记录深深吸引，觉得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文革武斗旁观实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我将其编发（连载）到了当时刚开始与吴迪兄共同编辑的电子刊物《记忆》中。

现在又读到了陈懋智老人的这部遗著，在阅读中，时时为书中那些常令人拍案惊奇的精彩情节和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所吸引，急于读下去，但又时时因书中字里行间所浸透的血泪而不得不一次次暂停阅读……真有一读三叹九回肠之感。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回忆录，也是一个平民家庭的家史，但又远远超出了一人一家的狭小范围，而让读者看到了从民国时代到“毛泽东时代”生活在内地一个小县城的书香之家两三代人的人生历程，其所反映出来的时代风云、民族苦难，具有为历史留下证言的意义和作用。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大陆就曾由官方组织过大规模的编写“四史”（家史、村史、社史、厂史）活动，不过，那时的所谓“史”，都是按照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这一政治“主旋律”的要求编写的，力图转移民众对刚才过去的大饥荒的惨痛记忆，而去控诉“万恶的旧社会”（而在实际的“忆苦思甜”宣讲中，那些被请来现身说法的老贫农则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把话题转到大讲三年大饥荒的苦难上来，让许多大会组织者防不胜防，尴尬不已）。当年为了政治需要，甚至可以编造诸如“冷月英坐水牢”之类虚构故事来，徒然留下历史的笑柄。时过

¹ 徐贲《为什么有的“文革道歉”不能被接受》，财新博客，2014年2月17日。

境迁，那些印量不小的“四史”书籍早已无人问津（实际上当时就很少有人去认真读过），甚至没人知道了。

《汉书·艺文志》中引孔子的话说：“礼失而求诸野。”其实不光是“礼”，许多情况都是这样，比如历史真相，在官方史著中看不到时，同样也只有“求诸野”，到民间史著中去寻找真相。

民间修史，平民撰写（或口述）个人回忆录、家庭史、家族史，近年已经不再稀罕。现在的这类私家史著，大多已经挣脱了过去“党文化”宣传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桎梏和文字狱造成的恐惧心理障碍，能够写出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感情。而对陈懋智老人这样既有家学渊源又自幼饱读文史典籍，还长年坚持写日记（除去文革时被迫烧毁的原有日记外，那以后他又陆续写下了编号保存的49本日记）的人来说，这样写出的个人及家庭历史，就更加具有真史、信史的价值。

这是一本十分可读也值得一读的书，也是一本具有丰富内涵与深刻反思的平民家史。

2015年10月25日于重庆风江阁

【书海泛舟】

沉甸甸的历史 ——先父遗著《浮生杂记》序

陈仁德

这是先父遗著《浮生杂记》，捧在手里沉甸甸的，但我以为沉甸甸的不仅是书本身，而是书中所包含的历史分量。

先父陈懋智，重庆市（原属四川省）忠县人，他不幸大半生都生活在一个被扭曲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官样文章泛滥成灾私家著述几乎绝迹。那些铺天盖地的官样文章全是从一个模子翻出来的，历史的真实痕迹被轻轻地抹去，人们看到的是涂抹着标准化色彩的文化标签。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私家著述失去了立足之地，试图秉笔直书的人受尽各种迫害，最终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笔。

先父并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上那时全国也没有几个勇敢的人——他当然也不敢有什么私家著述。但是，先父有两个优势，第一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第二是记忆力特强，早年的日记毁于文革浩劫之初，但由于曾经笔之于文，便印象很深，加上特强的记忆力，就使得他脑子里一直保存着一部较为完整

的“书稿”，八十岁后，先父奋笔疾书，终于写出了记述一生的《浮生杂记》。

作为一个并非以写作为业的人，先父的文字功底说不上有多好，但是他毕竟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信手写来，也不乏精彩之笔，最难得的是，先父的所有文字都始终高举着真实的旗帜，不论是抗战时期的出生入死，还是知青运动的生离死别，不论是土改的血腥残暴，还是反右的无耻下流，他都一五一十秉笔直书，即使是对于自己某些行为的自责，也从不文过饰非。他撰写的有关“三反”运动的文章前些年收入《重庆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后（见本书第五章《三反运动，我成了大老虎》），许多老人说，这是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真实的写“三反”的文章。毫不夸张地说，先父的《浮生杂记》就是中国几十年历史的缩影。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如果有缘看到先父这本书，一定会从中获得许多珍贵的史料，这就是本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先父写作此书时已年老体衰，文字表述往往力不从心，时有错乱，曾嘱我修饰润色。出版之前，我将全书从头至尾整理一过，也算完成他的心愿。同时，我将他的《日记选录》和我的三篇缅怀追忆的文字也附在后面，以俾更全面反映先父的人生。

2016年是先父诞辰100周年，就以此书作为对他老人家的纪念吧，想必他在天国里一定会为之高兴的。

2015年11月8日于重庆

【书海泛舟】

《浮生杂记》目录

陈懋智 原著 陈仁德 整理

第一章 流亡在长江上

到成都见刘湘——何北衡说：令尊大人有远见——初出三峡——张侠冷教我
吃西餐——群情激昂保卫大武汉——宋庆龄第一个登台献金——东湖遇险——
四·二九中日大空战——卢作孚把船票给了我——快开上去，这里马上要封锁——
舵叶被锚链缠住了——传来武汉弃守的消息——潜水英雄的精彩表演——宜
昌城里骇人听闻的误传——晴空霹雳震惊全家——举家仍聚一堂中

第二章 万里穿越沦陷区

我决定到海外去——我用越语说：“波兰街7号”——河内风景从头说——
住进香港六国饭店——既然来上海了就安心玩吧——日本小汽艇直直地朝我们

开来——日寇霍的一下拔出军刀——金色的光芒照到了国旗上——持枪战士大声喊：“什么人？站住！”——我看见了敌机座舱里的飞行员——永远不尽的是远方的天际线——那只木船被波涛完全吞没了

第三章 一切又从头开始

在家里闲着也不是个办法——目睹重庆大轰炸——我好像走投无路了——牌桌旁伸出几支黑洞洞的手枪——和日本战俘面对面——四面碰壁到处落空——天无绝人之路——蒋介石与我相距不到一米——回忠县老家当站长——终生难忘的婚礼

第四章 新社会来到我面前

新县政府派人找我——杀气腾腾阴风惨惨——举手表决杀张国锦——父亲死里逃生——六妹懋衡的悲惨命运——我姑母一家更悲惨——巧云拒绝忘恩负义——全体总动员焚烧沈氏藏书——李善厚母女的传奇故事——老中医大学生和道士

第五章 三反运动，我成了大老虎

打虎队遍布城乡——骇人听闻的诬陷——陶里汉跳楼——老虎上街要咬伤（商）人——我被投进监狱——四哥被打断了手——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敖陈二人双双跪在地上——无处藏身的金条——万分痛心的时刻——和余长远当面对质——可怜的余长远——家里还有金子？——最艰难的岁月——他们后来怎么了？——附：为历史作证

第六章 不可理喻的“反右”运动

陈顺平震撼人心的演讲——天字第一号右派产生了——我是又一个陈顺平吗？——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打破常规过春节——干部“光荣”上山下乡——帆船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暗夜，酒瓶伸进我嘴里——在《大跃进》歌声中劳动——在水田里创办纤维厂——王佳发一言获罪——青年们就像中了邪一样——砍一千根树建厂房——惨无人道的“开农业社伙食”——周福良催人泪下的凄婉爱情——刘继良纵身跳下万丈悬崖——杨秀翔暴尸荒野——张后华知错能改反遭撤职——揪出混进工人队伍的和尚——后来和后来的后来

第七章 从三年大饥饿到文革浩劫

1959年端午的牛肉之争——轰轰烈烈的铁路工程半途而废——判我五十年

徒刑都不算多——几天后就斗争王世怀——得玖大吐血和仕儿之死——得玖镇定自若面对大手术——大饥荒中故地重游——邂逅“已被枪毙”的廖上柯——灾难一个接一个——父亲写好遗书四哥却先逝——父亲撒手西去了——“四清”运动是文革的预演——我成了“四不清”干部——老宅忽然遭遇横祸——他们逼我“自动退休”——我们自己动手破四旧——我为慈母送终

第八章 儿女们的命运

送陈琳下乡的悲惨场面——对“大有作为”的绝妙讽刺——陈玉惨死在雨夜——知青成了低贱商品——陈琳办病残回城——储德远走雪山高原——艰难的婚事——不幸陷入冤狱——仁德也去了水坪——是我害了儿女们——费尽心机最后还是失败——报名当兵再受伤害——去拔山前仁德嚎啕大哭——刻苦自学终于成才——陈瑜插队七年——仪德做苦力补贴家用——仪德靠勤奋和才能取胜

附一：日记选录

重庆武斗日记

附二：缅怀追忆

父亲的《重庆武斗日记》——父亲的洞箫——先父之雅好——父亲的几个人生细节——生命中最后的相送——在父亲追悼会上的讲话——清明祭父文

【书海泛舟】

儿子储德的遭遇

（《浮生杂记》选读）

陈懋智 原著 陈仁德 整理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浮生杂记》第八章《儿女们的命运》，现标题是另拟的。

储德远走雪山高原

1965年女儿陈琳去农村当知青的次年，儿子储德又初中毕业了，出路依然是下乡，作为父母，我和得玖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恰恰这时我又被迫退休，家

中经济压力极大。

动员上山下乡的又开始登门软硬兼施了，这次他们瞄准的是储德。正当我们苦心焦虑无计可施时，听说阿坝藏族自治州壤塘森林工业局来忠县招工了。我们知道那是藏族人居住的地方，属于青藏高原的东部，平均海拔 3000 多米，雪山上终年积雪，人烟稀少非常荒凉，去那里做的工种是伐木，特别危险的重体力劳动，从内心讲，绝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那里去，可是想到当工人有工资有粮食，总比下乡当农民强，就动念让储德去报名。结果报名后却没录取，说是名额满了。我知道这一定又是政审通不过。为此，我去找老同事秦光明帮忙，秦是城关镇委书记，他很痛快地说，既然已经有一个下乡就行了，同意添上储德的名字。就这样，1966 年 10 月 18 日，16 岁的储德就远走雪山高原，开始了漫长的林区生涯。

储德是有才华的人，壤塘森工局领导看重他，安排他到森工局政治工作组机关上班，忠县一起去的很多人都是上山伐木，人们都羡慕他，也有的嫉妒他。

这正是文革高潮时，偏偏荒远的壤塘深山里文革也一样搞得轰轰烈烈，储德和另外 11 个忠县人一起返回家乡闹革命，在忠县十字街口，储德看到一张揭发财政局长周广德的大字报，其中牵连到我，吓得他马上返回壤塘。森工局说储德等 12 人是自动离职，拒不接受，经向有关部门说理争论仍无结果，储德一行不得已于 1968 年 10 月 6 日去成都上访，经四川省同意，他们又返回壤塘，1969 年，森工局批准他们为新工人。

仅仅一月后波澜又起，2 月 1 日，森工局宣布凡是忠县、云阳来的工人全部放回原籍，否则就在壤塘农村就地插队落户当农民。形势非常严峻，忠县、云阳籍的工人一时被推到绝境上。2 月 13 日，正值腊月三十，森工局不由分说一意孤行，在传统春节的团圆之日，将包括储德在内的两县工人全部装上汽车，强行送出壤塘。为了防止工人们路经州府和省会时上访，特意安排汽车绕过马尔康和成都直达简阳换乘火车，限三天内昼夜兼程赶到重庆，不开证明不准投宿旅馆。

汽车当天翻越海拔 4000 多米的鹧鸪山，一路前往简阳。工人们发现汽车未过马尔康，明白了森工局的用心，晚上 10 点，当汽车在夜色中经过灌县时，工人们全部下车拦住去路，强迫汽车开往成都。到达成都时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了。这一群都只有十多岁的孩子在寒风中徘徊成都街头，一致决定到省上去告状。他们在省革命委员会的大门外一直等到天亮，几经周折，终于在 18 日得到了省革委会的支持，拿到了文件回到壤塘。

8 月 22 日，更大的麻烦来了，森工局生产指挥部正式下文件宣布，根据 226 号文件精神，凡属 66、67、68 三届中学毕业生，不论已否分配工作，包括被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招收的、甚至已经入伍当兵的，都一律退回原籍上山下乡插

队落户。储德是初中 66 届毕业生，又成了问题。当下他们又到成都上访，说根据国家“四个面向”的原则，是可以留在壤塘的。“四个面向”是当时的就业原则，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省里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他们才再次返回壤塘。这些青年人的命运真是悲惨，生不逢辰，连在深山老林当个伐木工人都要经历这么多磨难。

艰难的婚事

1972 年 8 月，忠县有人以一个女人的名字去信壤塘诬告储德在回乡探亲期间耍女朋友，领导不加调查，仅凭一纸空文就信以为真，将储德从局政工组调到工段劳动，这无异于处分，使储德意志大伤，从此处境每况愈下，一落千丈。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缺德的人写的信。

储德已经成年，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基本上无人提亲。幺叔（陈霖甫）关心储德，将解放前在我家开的协兴祥纸铺当过学徒的朱光烈的女儿朱某介绍给储德，朱家父女都欣然同意。一日，我家请朱某来吃饭，她满口答应。那时物资非常紧张，我们好不容易准备了一桌酒菜，到了吃饭的时候，菜都上了桌子，却迟迟不见朱某来。再等，还是没人来，我们全家都有些着急了。朱家就在我们大院后面不远，两三分钟就可走到，陈琳和陈瑜两姐妹就到朱家去请，谁知朱某的母亲和外婆竟拦住朱某不让走，当着陈琳陈瑜的面恶狠狠地说：“我们是什么成份？他们是什么成份？我们的阶级不同！不准去！”边说就边把朱某往屋里拉。陈琳陈瑜两姐妹受此羞辱，面子丢尽，顿时变得灰头土脸，回到家里告诉我们，全家都非常沮丧，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尊严了。

以后熊安芳介绍他哥哥的姨妹、重庆长江织造厂（后改重庆绸厂）女工张凤仪给储德，经在重庆多次见面，彼此情意相投。1973 年 1 月 30 日储德回家探亲，张凤仪同来我家，张落落大方颇有风度，经交谈，竟是二十六年前我任四川粮食储运处稽核兼股长时的部下张鸿仪的女儿，真是有缘。张凤仪在忠县逗留七天后回渝，大家对她印象不错，我们家也因此有了一段短暂的欢乐，后来，因为两地相距太远，此事遂作罢。

1974 年 3 月，陈琳的中学同学、忠县丝厂女工胥志华介绍丝厂同事、石宝人傅安兰给储德，两人于 1975 年春节结婚，同年冬月 15 日生陈淳。

1976 年 9 月，储德调到距壤塘 100 多里的和青海邻近的 504 段，那里是自有人类以来人迹罕至的地方，事后得知是因为看了所谓的黄色书籍所受的变相处分。由于处境日益恶劣，只有设法脱离壤塘，经仪德多方设法反复奔走历尽艰难，终于联系好了调回忠县物资局工作，9 月 28 日，忠县劳动局去函壤塘调档案，

12月23日档案寄到忠县，1977年1月忠县物资局出具公函正式同意调入，我们全家皆大欢喜，此时距储德远赴壤塘已经11年，终于能够回家安居乐业了。

不幸陷入冤狱

储德的调动已经接近尾声，估计储德在壤塘很快就会办完调动手续了，全家都盼望着储德早日回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可是这时储德却没有了消息，我们到处打听，始终得不到确切消息，不免心急如焚。7月，安兰前往壤塘探亲，才知道储德又惹出大祸了！

1977年，新上台不久的华国锋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双打”运动，“双打”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和打击刑事犯罪，壤塘森工局为开展运动办了一个法纪学习班，把所谓有问题的人关起来强迫交代，储德因为看过“黄色书籍”也进了法纪学习班。执事者非要储德交出早已烧毁的原书，否则就不能过关。

学习班鼓励里面的人互相“揭发”，储德因为曾经在闲谈中评价过华国锋的相貌如何如何，被人揭发，竟于9月27日，也就是中秋佳节那天以“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入狱。消息传来，全家震惊，痛彻于心，安兰更是日日以泪洗面，此时陈淳还不到两岁，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已经入狱，还天天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储德在调动只差最后一步时沦为阶下囚，所有努力都前功尽弃了。

1978年1月27日，壤塘人民法院以《壤法（刑）78判字第002号》判处储德有期徒刑6年，送金川劳改农场改造。自此，储德已经身陷火坑，我们一家都成了“反革命家属”，社会地位迅速下降。储德对家庭是还有贡献的，在壤塘不定期寄钱回家，解决了家庭部分困难，这下一切都完了。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冤案，评价华国锋的相貌，即使说错了几句，怎么就是反革命呢？这岂不是小题大做借题发挥践踏人权？我们不断向四川省高级法院、马尔康中级法院和忠县法院申述，据理力争，要求平反，先后写了不下数十次申述。1979年，壤塘法院自知理亏，以《壤法（刑）79判字第128号》改判为四年。对此我们认为仍然不彻底，继续上告要求彻底平反，又先后写了大量的申述，包括写给最高人民法院。

1981年，平反冤假错案进入高潮，我们也不断申述，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看到了希望。1981年1月15日，周成森从壤塘回家探亲，他也在“双打”运动中坐过牢，他告诉我们，储德即将彻底平反无罪释放，我们将信将疑，但心中却非常高兴，将此喜讯写信告诉各地亲友，让他们分享喜悦。

1月23日，果然收到储德从金川来电：“我已平反即赴壤塘”，电报内容马上

传遍陈家大院，传说成了现实，是天大的喜事。想起三年多的苦难冤屈，想起无端受害，我们见人不敢抬头，志气都低了，这下可以昂首挺胸在人们面前不自卑了。

不久果然接到壤塘县人民法院正式通知，1980年12月31日《壤法(刑)80判字第52号刑事判决书》再次改判：“一，撤消《壤法(刑)78判字第002号》和《壤法(刑)79判字第128号》两次判决。二，宣告陈储德无罪。该案属于错案，应补39个月工资1722.92元。”

储德1981年2月16日恢复工作，分在直属段。3月返回忠县，我们全家到码头迎接，当见到历尽磨难的储德从轮船走下时，我们的心情无法形容，眼中泪花模糊。储德的女儿在他蒙冤入狱时只有一岁多，此时已经五岁多，早已不认识自己的父亲了！真是人间悲剧。仁德当时赋诗多首，选录如下：

储德兄平反昭雪自壤塘归来

翘首认君来，中心忽一哀。凝眸如梦寐，执手费疑猜。
毒火炼孤胆，艰辛磨壮怀。沉冤欣已雪，重过旧时街。

重过旧时街，门前踏绿苔。等闲论浩劫，谈笑忆奇灾。
真假亡其所，人妖混一台。天高云渺渺，何处问由来。

何处问由来，春花落又开。恩仇休刻骨，成败亦忘怀。
且喜躯尤健，所欣鬓未摧。合家都在侧，不用觅蓬莱。

不用觅蓬莱，故山亦有台。平安沾雨露，稳健踏尘埃。
旧梦何须忆，雄图尚在怀。诗成一长啸，翘首认君来。

仪德又重新设法将储德调回忠县丝绸厂，1982年1月，安兰赴壤塘接储德，他们于19日离壤塘，24日回家，正是除夕之夜，举家欢喜。储德自1966年离家去壤塘，迄今已16年矣，其中之悲欢离合艰难困苦岂常人所能理解，尤其是蒙冤下狱三年多，其所遭遇之痛楚，不啻人间地狱，真是言之痛心。

储德在丝绸厂工会上班，他爱好书画摄影和写作，主编厂报《丝绸之声》和《丝绸厂志》，后来调建委办公室工作，先后在各种报刊发表文章约20万字，获得全国各类书画摄影大奖20多次，新版《忠县志》中许多照片都是他拍摄，他还出版了个人摄影画册《古镇忠州》，是忠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忠县政协委员，

重庆市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

【书海泛舟】

那山那人

——《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序

谢声显

《昨天》编者按：陈仁德著《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一书，已于2016年1月自印出版。

忠州陈仁德以诗词创作成就名噪国中。有点遗憾的是，仁德之文名却为诗名所掩，他还有《陈仁德文存》，皇皇六卷，百余万言。其中许多文章，我曾当作“忠州乡土志”读过。

前些天，收到仁德发来的电子文本《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又是20万字，还嘱作序。我因为俗事缠身，再加上年近古稀眼疾严重，近年来，对长篇就有些畏惧。连许多朋友交口称赞的书买回来后，放在架上都没读，遑论这更费眼神的电子文本？却又想到仁德与我相交多年……

没想到一读之下，却使我眼不离屏时间远超医嘱。在细读此书的几天之中，仁德那儒雅旷达的形象就一直在我脑海中晃动。

1973年至1979年，仁德正值生命中的黄金时段。这几年，在神州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这本书记录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偏僻贫困的山沟，有那么一些人特别的生命轨迹。

时年21岁的仁德作过知青又当过工人。这一年，他脱离了体力劳动的群体，被组织调到了大山深处的显周人民公社。先当公社多种经营员，后作生产门市部营业员。

县城里长大的仁德说：在没有进入显周场之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小的乡场。

整个显周场只有几十米长，相当于一个大院子，仅有10来间东倒西歪破旧不堪的土木屋，一分钟就可以从场的这端走到那端。这便是显周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所在，方圆几十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仁德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和山沟里的山民们在一起生活了6年。

这是那年那月川东山乡的一幅生活长卷，这本书记述了一段正在消失的真实历史。

这里的农民因买不起手纸，不分男女大便后都还在用竹片作为替代。而“当家作主”的人民公社社员们终年辛劳，全年却只能在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能享受3次猪肉配给，每人每次半斤。还有从出生到上学，家里一直还没有买到定额配给的那一斤可怜的“婴儿糖”，不知道糖是什么滋味的小学生……

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最刻骨铭心的，是自己成长时期的经历。

年青的仁德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冒险钻进深山洞穴探寻毫无价值的夜明砂。

在一个美好的春日，卖氨水的仁德几乎被氨水夺去年青的生命。

在政治运动“三分之一”时，仁德成了积极分子，不是团员更非党员，竟受组织的委托去发展共青团员。

为了开阔眼界，仁德曾效历代文人搜奇访古，遍游名山胜川。他筹了150元钱，开了张病情诊断书，欺骗组织请病假畅游数省，探亲访友。路途上他省吃俭用，游历一月，就那点钱还能买了许多礼物带给家人。

其中许多情节，虽然现在的青年人很难想象，却是非常有力量的，真是微言大义，令人动容，是一个逝去的时代在普通人生活中的投影。

“批林批孔”运动中，学历仅初中一年的仁德才第一次看到《三字经》和《增广贤文》。这些“供批判用”的“反动文字”，却像雨露洒到沙漠上一样，立即被他吸收了，从此深深地植根在他心中。

他担任过生产队副队长，带领社员们辛辛苦苦地造“大寨田”。

仁德还办过政治夜校，教社员学习“马列的六本著作”。自己也不甚了了的陈队长认真地在上面讲，一群根本听不进去的农民在下面恍恍惚惚地听——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征，所有荒唐都极其庄严地上演着。

他的恋爱和婚姻也有时代特色：与崎岖的山路紧紧连结，崇山峻岭，险沟深壑、悬崖峭壁，有的地方几乎没有人烟……

他也曾受组织信任，选派去侦破伪造肉票案。

“双打运动”时，他奉命扛着一支步枪，到县城监狱里去把在押的罪犯押回来接受斗争。

儿子刚才出世，他却被怀疑贪污了鞭炮的进销差价而受审查……

仁德替自己留下了纤毫毕现的成长记录，他除了讲述自身的经历，也讲述了众多身边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无不镌刻着那个时代的印痕，包含着很多睿智的人生启示。

显周小学那位青年教师陈时俊，他一到显周便展示出过人的才艺，征服了学校所有的老师；另一位青年教师余宏根，曾当过重庆“红卫兵第四野战兵团”的司令；还有在知青户的墙头挂着一支苏式冲锋枪的重庆女知青王安惠……

“地主狗崽子”韩国伟，他不到3分钟，便能用毛笔画出一张和官方制作的

真票不差丝毫的肉票和红色印章。

由重庆插队到显周公社的知识青年“马儿”，刚满 17 岁便惨死于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围攻，成了“马绍成烈士”……

这些那年那月的青年人不同的经历和命运，传达出多少时代与个人的信息！

许多不同身份地位经历的人各具个性，仁德寥寥几笔，便令其跃然纸上，栩栩如生。那些入木三分的性格描摩，让人感受到文学手段在真实讲述里的非常力量。仁德的文笔简约干净，不拖泥带水。我想，也得益于他熟读古典文学，深受熏陶所致。

当年，在底层挣扎求生的环境，对于一个家庭出身不好、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真是一个险境，很多人就是从那里染上恶习坠入深渊的。而仁德却能一直保持着是非清楚心灵纯正，这应得益于他那世代书香的家庭环境和似乎天性使然的读书嗜好。他是从读书中学会了分善恶辨是非，奠定了自己的行为操守和思想根底。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仁德把大量的业余时间都用来自学文化，土屋寒灯，孤影残卷，他就那么打发着寂寞的时光。如果没有那时的自学，仁德的人生将会是另一回事。

有位小说家说，纪实性文章易写，易在用不了太多的精力构思人物、故事、情节和细节。但纪实性文章又不好写，难在对一些历史的人物和事件的准确评判和把握；难在对一些单个的人物和众所熟知的环境在枯燥上做出趣味。

我觉得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可能就在于它的寻常，和寻常中所孕育的成长的执著和生命的力量。时代纵然可以随意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然而它却无法抹去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即使在不断坠落中所显现出的生命的光彩。

我希望凡是经历过生活之痛的人，都拿起笔来，去写下各自的经历，这是对自己、对家人、对国家负责的态度。人之所为人，就是不能让苦难如烟而逝，因为人都向往更有尊严更幸福的生活，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出自己切身的努力。

2015-11-2

【书海泛舟】

纪念那些逝去的岁月

——《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自序

陈仁德

人的生命过程曲折漫长，其中大部分都平淡无奇，真正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

只有很少部分。在我过去的生涯中，印象最深的只有青少年时代。我的青少年时代始于三年大饥荒，经过文革大动乱，知青运动，终结于显周岁月。我有一些文章断续记录了那个时代，其中对显周的记录稍多，大约有三四万字。2012年，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既然已经写了那么多，不如再加写一些，连成一个完整的显周回忆录。于是我开始写作这部作品。动笔后才知道并不是“加写一些”那么简单，回忆的闸门一打开，许许多多的往事便涌上心头，写起来很累，也很忧伤。有几次想搁笔不写了，但看着已经完成的部分，又觉得就此中断太可惜，便硬着头皮写下去。偏偏最近几年是我生平参加文化活动最频繁的时候，几乎每月都要应邀外出，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写作任务也必须完成，更重要的是，我还在一家杂志社任职，留给自己支配的业余时间很少，有时两三个月都无暇动笔。写写停停，到2013年底，总算草草完成。

在那个时代，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都是“革命的螺丝钉”，被拧到哪里就死死地呆在哪里不能挪动，除非有一天偶然被拧到另外的地方。去显周之前，我这颗“螺丝钉”曾经被拧在农村当农民，也曾经被拧在一个小作坊里当工人。21岁时，我又被拧到了显周，我的职业先是公社多种经营员，后是生产门市部营业员。我得承认，我不是个优秀的多种经营员和营业员，我做这些工作虽然并没有什么差错，却也谈不上什么业绩，其原因可能是我被拧错了地方。如果拧到另外的适合我的地方，我或许会创造出业绩的。这种想法只有在今天才可以说出来，在当时是不可以说，甚至也不可以想的。

那时显周场之荒凉，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之恶劣，均超乎想象。山区的贫穷、愚昧、疾病、疯狂、死亡、奋斗、创造、爱情、婚姻、眼泪、欢笑……是那么鲜活地交替呈现在我面前。感谢显周，让我磨练了意志，进一步认清了中国社会底层的真面目。

由于我从小就饱经忧患备尝艰辛，故对显周的一切均能坦然面对安之若素。在这个贫瘠的山沟里，我和山民们成为了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和我保持着密切联系。2012年我在重庆举行“陈仁德六十寿诞暨文学创作四十周年恳谈会”时，显周故人、67岁的黄天雪老师还专程赶来祝贺。而我也曾多次返回显周去看望老朋友，去追怀逝去的青春岁月，去重游那里的山村田园。当然，我在显周也看到了一些丑陋的嘴脸，这种丑陋让世界变得更加生动，社会舞台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最应该感谢显周的是，在那些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把大量的业余时间都用来自学文化了，土屋寒灯，孤影残卷，我就那么打发着寂寞的时光。如果没有那时的自学，我的人生将会是另一回事。黄天雪老师后来经常对他的显周学生们说：“你们去看看陈仁德当年住的那间土墙房子，他就是在那里勤奋自学，从那里走

出去的。”2013年夏天我再回显周，那间屋还在，我轻轻推开门走进去，双手久久抚摸那堵残存的粗糙无比的土墙，像拥抱久别的亲人一样。

一切都过去了，显周已经成为我人生的重要生命符号，这部作品，就是对这个生命符号的解读。我力图用我的笔去还原那个渐行渐远的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的时代。文字难免粗糙，内容却非常真实。出于尊重隐私等方面的考虑，个别人物使用了化名，此外所有时间、地点、人物、情节无一虚构。因时隔40年，或有细小之误，当亦不多。

谨以此纪念那些逝去的岁月，纪念到显周40周年。

2014年1月28日（除夕前二日）

【书海泛舟】

《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

目录

陈仁德

自题卷首

如烟往事总难忘，回首青春易感伤。
万里河山悲浩劫，十年风雨走穷乡。
乱云深处家何在，噩梦醒时夜未央。
老去陈郎头半白，无端却忆显周场。

第一章 初到显周

【1】21岁从这里开始【2】如此显周场【3】潘经理和同事们【4】“搞工作怕臭，行吗？”【5】跟着潘经理下队【6】赶场的日子很热闹【7】我其实还是一个孤独的“知青”【8】走进显周“文化中心”

第二章 新的生活

【1】门框上倒挂着一条蛇！【2】并非爱情的故事【3】宣传推广土农药【4】显周场上的“疯景”【5】与张亮的奇特邂逅【6】风雨之夜潘经理逐客

第三章 极度匮乏

【1】小学生不知道糖是什么滋味【2】吃肉何其难【3】阎玉成怕把三两米搞脱了【4】米糠的致命诱惑【5】仲夏夜的噩梦【6】穷极无聊的娱乐【7】“莫在拐哟，晓得拈啰。”

第四章 与诗为伴

【1】我的第一个唐诗选本【2】八爷爷的早期启蒙【3】一段难忘的对话【4】“仁德的诗词还没有入门”【5】我将以前写的诗词全部烧掉【6】天天盼望胡先生复信【7】四野虫声伴读诗

第五章 交新朋友

【1】见到一位陌生的青年老师【2】又来了一位青年老师【3】和高三崽儿在一起【4】被扔到八阵图那里【5】走在坎坎坷坷的栈道上【6】同学们，战友们，都上来吧！【7】一个青年工人的惨死【8】他在黑暗中猛扑上去【9】猫儿忽然发酒疯【10】七四一号文件发下来

第六章 马儿之死

【1】“马绍成烈士”是谁？【2】响起了阵阵“捉特务”的呼喊声【3】乱棒从四面八方劈下【4】马儿尸横旷野魂断异乡【5】周围几座山全站满了愤怒的农民【6】坟上的树已又粗又高【7】全县爆发了一场围攻知青的运动战【8】这一切到底是谁之过？

第七章 “三分之一”

【1】认识沈昌荣【2】美丽的萧家湾【3】无法下咽的忆苦饭【4】精彩的忆苦表演【5】复员军人的故事【6】非团员负责发展新团员【7】深山洞穴探寻夜明砂【8】一斤糖精与物资交流会

第八章 假肉票案

【1】发现假肉票【2】审问韩祥生【3】是韩国伟干的【4】美术天才的悲哀【5】八两荞面和两行眼泪

第九章 苦乐插曲

【1】“供批判用”的经典【2】陈时俊：“请你吃年糕”【3】曾先龙：“共产主义的平方”【4】杨秀维：“想换一个胃”【5】猫儿：“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6】跳楼捍卫纯洁的爱情【7】暗夜里，标娃子暴死

第十章 浪迹江南

【1】向往江南已久【2】穿越雄奇大三峡【3】走遍武汉三镇【4】感受东湖的美丽【5】南京城，玄武湖【6】瞻仰中山陵【7】警察拔出手枪对着我【8】我真的到上海了【9】从动物园到豫园【10】南京路上流连忘返【11】荡舟西子湖【12】游灵隐寺和品龙井茶【13】看遍杭州风光【14】我在火车上站了18个小时【15】柳州城外痛悼亡兄【16】到贵阳寻访表姐【17】一切又回到原地【18】江南之行念念不忘

第十一章 当队长去

【1】区委出台了新政策【2】袖珍乡场上的众生相【3】最有名的人是姚毛【4】深夜古庙里的怪异声音【5】这一餐饭我终生难忘【6】辛辛苦苦造“大寨田”【7】改造懒汉姚毛【8】办政治夜校【9】重返吴家场

第十二章 铁竹木棕

【1】同时兼管两个门市部【2】我直接服务农业【3】氨水池旁惊魂一幕【4】来了个水灵灵的女知青【5】女知青跳楼殉情【6】端午前夜颜光宗被砍成重伤【7】我如此坚持原则【8】知青要把老人重做过【9】公社厕所景观【10】宏伟的黄钦水库【11】长冲水库惨案

第十三章 青春碎片

【1】应该考虑婚姻大事了【2】我有门槛，你有脚杆【3】猫儿失恋后的生日【4】徒步往返40里路看电影【5】除夕夜谁也不许哭【6】我把她的床铺弄得一塌糊涂【7】完全意想不到的奇迹【8】爱情真的来叩门了【9】《西厢记》的离奇遭遇【10】风雨中穿越80里崎岖山路【11】啼笑皆非的小故事

第十四章 路线教育

【1】工作组来了【2】熊熊燃烧的墙架向我迎面砸下【3】我的皮鞋成了忆苦思甜的道具【4】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第十五章 萧瑟秋风

【1】“双打运动”开始了【2】哥哥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3】张部长发给我一支步枪【4】一大群被捆好的囚犯【5】犯人捆得杀猪般地嚎叫【6】一个如同乞丐的女人哭着跑来【7】这次轮到张部长坐牢了【8】都是因为政策“英明”

第十六章 挥手告别

【1】我儿子在土屋里诞生 【2】我受到可耻的诬陷 【3】终于返城了

【书海泛舟】

荒唐往事二则

（《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选读）

陈仁德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录自《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第九、十一章。现标题是另拟的。

“供批判用”的经典

1974年春节回到忠县家中只有短暂的四五天时间，又赶回显周上班。不几天，陈时俊和猫儿也回来了，大家一起畅叙春节期间的见闻。这时批林批孔已经掀起了又一轮高潮，我们见面无非是谈国家的形势，经过文革的戏弄，我们早已不会轻信什么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之类的宣传，私下里只当成笑话来调侃。试想，林彪不是你毛泽东一手培养的接班人吗？林彪不是你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吗？就在两年前的“九大”上你毛泽东不是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至高无上的《党章》吗？你毛泽东不是能够洞察一切吗？你考察了林彪30多年怎么没有洞察到林彪的野心呢？林彪不是天天高喊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者，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吗？怎么又在《571工程纪要》中说毛泽东是绞肉机，是B-52轰炸机，是秦始皇，甚至要用火焰喷射器谋杀毛泽东……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刚才打倒了刘少奇这个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怎么又出了个比定时炸弹还厉害的火焰喷射器？说好也是你们，说坏也是你们。这叫怎么回事？搞政治就是这个搞法吗？

作为批判材料，《三字经》《增广贤文》也印发了，封面上用黑体字印着“供批判用”，据说这些都是林彪用来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这却使我们有机会第一次读到了这些启蒙读物。《增广贤文》开卷就说：“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仔细看去，便有“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反复看后，认真思考，觉得这些话一点没有错呀，

为什么要批判呢？

在批林批孔的文件中，竟然读到了少量《论语》和古代格言。如“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一灯能灭千年暗，一智能除千年愚。”“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出入六合，游乎九州。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至用也。”“不偏不倚，谓之中庸。”“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这些供批判用的文字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1949年以来，这些读物全部被封杀了，我年满21岁才第一次看到这些，而且是作为批判材料印发的。如果不是用于批判，还看不到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执政者没有想到，他们用于批判的东西，却像雨露洒到沙漠上一样，立即被我吸收了，从此深深地植根在我的心中，终生受用。

办政治夜校

在勒紧裤带学大寨的日子里，我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组织社员们学习马列的六本著作和“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

吴家场上的农民基本不识字或者识字极少，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年年月月周而复始，对山外的世界一无所知，更遑论整个国际社会。在极度封闭的时代，即使是农民中那些极有智慧的人，也无从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对于所谓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了解，就是“那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放”。本来，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知道“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没有必要去知道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他们祖祖辈辈都平静安详地生活在这块群山环抱的家园里，他们虽然有贫困、疾病和烦恼，但是也有自己的快乐，并不像有些人反复鼓吹的那样长期生活在阶级压迫和剥削中。1949年以来，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他们，被无情地卷进了政治漩涡中，他们的一切都和政治捆绑在一起，不再享有宁静的牧歌式的生活。在“翻身做主”的光环笼罩下，他们开始忍受前所未有的饥饿和无休止的劳役，不仅如此，他们还要一次又一次地被强迫去“学习”那些与他们毫无关系的走马灯一样变着花样的“政治理论”。现在，轮到他们学习马列的六本著作了。

按照当时最吃香的做法，组织学习叫做办政治夜校，教室是现成的，就在安乐小学我住的房间外，教材也是现成的——“马列的六本著作”，教师当然就是我了，我是队长，又是公社派来的，在吴家场无疑也是文化最高的人。

于是，在一个黑沉沉的夜晚，安乐寺的教室里点亮了几盏油灯，二十多个人

坐在我的面前，听我讲“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

自成年以来，我就对什么“光辉理论”之类的东西缺少兴趣和研究，而且，我自己确实也非常肤浅，中学只上了一年就“停课闹革命”了，没有读过什么书，对“巴黎公社”、《法兰西内战》什么的根本不知道。但是我毕竟还认得些字，赶紧把那些书看看，也就知道了什么“茹尔法夫尔”“梯也尔”“俾斯麦”等等。可怜的是我面前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起，甚至根本就没有名字，现在要他们来听这些“光辉理论”，简直比听天书还难。但是，毛泽东说了“要使全国知道”，他们就没有理由不知道。

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看见 60 多岁的刘松云也佝偻着身子坐在那里，一种莫名其妙的目光从他模糊的眼中透出来。他显然想努力地听懂什么是“茹尔法夫尔”，但是完全没用。看得出来，他吃力的程度远远胜过了开山打石头。

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喜剧的事情之一，一个根本不懂的人很认真地在上面讲，一群根本听不进去的人在下面很认真地听。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征，所有荒唐都极其庄严地上演着。

这样的夜校当然是不能持久的，和那时所有昙花一现的“新生事物”一样，办了两次后就再也没人来了。

【书海泛舟】

《文革词汇》前言

陆文光

《昨天》编者按：八旬老人陆文光先生编著的《文革词汇》一书（近 60 万字），已于 2016 年 2 月由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陆文光简介：1935 年 9 月生于浙江东阳，1960 年南京药学院（现中国药科大学）毕业，先后在广西医学院和浙江省人民医院等单位从事药学工作。1996 年在主任药师位上退休。2004 年专职重修《东阳陆氏宗谱》。退休期间收集有关文革素材。编写《文革资料选》、《文革广西缘》、《文革词汇》、《文革事件》、《文革人物》等。

我出生在一个半文盲农家，当时正处在家乡沦陷时期，老蒋、鬼子和各式各样的游击队都要前来我村。当时生活与学习的条件极差，但从小却受到了祖母、妈妈及亲友口授的一些文化历史启蒙，又看了许多婺剧和“嵊县戏”（现越剧），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有点启蒙。

日本投降后，在小学得到近代史国耻与爱国主义教育。解放后在中学时期得到社会主义教育，在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土改、合作化等运动中有不少感受，与此同时，我对历史一直颇有兴趣。1955 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我们杭州一中 13 班 50 多同学全都报考理工，只有我报考医药类专业。

1957 年在南京药学院二年级开始，全国进入了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代，学习和工作期间，都要不自觉地投入政治学习。我在政治学习与社会活动中，特别是在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中，凭着记录与自身的记忆力，积累了较多的东西。

四清和文革时期，虽然在广西医学院医院的药学业务很忙，只能利用假日，但利用星期天、夜晚和值夜班调休时间，投入了一些“革命”活动，收集了不少文革中的传单、小报等东西。很可惜的是，多年来我收藏的大量资料（包括不少派性的传单、小报和一整套从创刊到文革的《红旗》杂志），在运动、下放和 6 次工作调动与搬家过程中丧失了相当部分，但是，毕竟还残存下几个纸箱的资料。

1987 年回到浙江省人民医院工作后，我订阅了几种文摘报，利用假日和晚上时间，摘录了许多文革的材料，经整理后先后在 2006 年 2 月与 2011 年 1 月编成了自印的《文革资料选》、《文革广西缘》。

本书是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经整理、修改和加工而成的。由于文笔功底太低，且年事已高，精力大不如前，所以书中仍有不少粗糙、重复及表述不准确之处，当然会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恳望读者提供批评指正。

在此，我要感谢我爱人刘秀珍以及卿云波、王贵法、于永远、葛雅青、潘文敏、王诗珧、刘秀萍、陆远东、陆远阳……等亲友的劳动。

再次感谢陆建鸣教授、王茂根编辑的帮助。

更感谢作家章胜利以及黄正纯、徐小青、单乔乔、许满香等老师近期给我的大力协助。

2016 年 1 月 于杭州

【生逢乱世】

“学农”：文革时期学生的必修课

湖滨散人

文革前执政党的教育方针是什么？现在的学生当然回答不上来，当时所谓党的教育方针，是这样两句话：“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那个时候，学校的围墙上刷的是这两句话，教室墙上张贴的也是这两句话，可以说这两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文革以前，大凡学生，都是要参加生产劳动的，不管你是大学生、中学生，还是小学生。

“学农”的来历

文革开始不久的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写了一封信，谈到军队、工人、农民和其他行业的人员的工作和学习问题。其中有一段是专门针对学生的，引述如下：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为了称述的方便，报刊和文件上就将毛泽东的这封信称之为“五七指示”。有了毛主席的这条最高指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就更是教育这个议题当中的应有之义，是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了。如果一个学生不参加“学工”、“学农”的生产劳动，轻则受到批评，重则要遭到批判、打击。学校领导一声令下，学生们浩浩荡荡，或进工厂，或下田间，谁胆敢违拗？

为了落实“五七指示”，我们当时学习的课程名称也变了，“物理”称之为“工业基础知识”，简称为“工基”，听起来似乎成了和“母鸡”对应的“公鸡”；化学和生物的有关知识合成一本书，叫做“农业基础知识”，简称为“农基”，这个名称听起来也容易误解为“关在笼里的鸡”。这些新名词现在人们听起来似乎有些怪模怪样的，但是当时听起来蛮顺耳，说起来也很顺溜。

“学农”的两个场所

我们学校所在的地方是农村，方便“学农”，就要跟随贫下中农去田间劳动。当时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合格的农民，大家学成后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现在我们学习知识要联系实际，要学以致用，因此我们就要边学习，边到农田参加生产劳动。

“学农”劳动的场所有两个：一个是学校农场。文革时期，很多中小学都有农场，一个农场，上十亩，或几十亩的土地，田亩的多少往往根据学校的大小而

定。当时我所在的学校的农场就在学校附近，大概一二十亩。这些土地既有旱田，栽种的是棉花和黄豆等作物，还有水田，栽种的是稻谷。我们在学校农场里的劳动主要是栽秧、割谷、摘棉花、开沟挖渠，或者田间管理——除草、间苗、剪枝等。除了平时零零星星的劳动时间外，每个学期，我们至少有一个星期的集中劳动时间。对于到学校农场劳动，我们心里还是非常期盼的，因为既可以喘一口气，让沉闷乏味的学习生活暂时离开我们，而且在每天中午还可以吃一顿饱饭，因为在这一周的农场劳动期间，学校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谁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当时就领受过。由于田少人多，集中劳动的时间有限，劳动不是十分繁重。

再一个“学农”劳动场所就是农村生产队，到生产队劳动叫做“支农”。

关于“支农”劳动，不妨细说一番。

实话说，“支农”劳动那才是真正的劳动，和在学校农场里的劳动比较起来，一个是蜻蜓点水式的，一个是深水潜泳式的，所付出的体力和时间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支农”一般在农忙季节，或插秧，或摘棉花，最少要劳动两三天，最长的时间大概应该有十天半月吧。有时候公社领导将我们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后，让我们吃住在农家，每天和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回家，在一个不很熟悉的家庭里生活一段时间，还是有一点新鲜感。住户为了表现自己的热情，往往想尽法子做一点好吃好喝的，比如偶尔做一碗鱼虾，或蒸一碗鸡蛋羹，让我们的饕餮之欲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虽然辛苦，但是心里有时也还有一种惬意感。由于我们是学生，又没有要记多少工分的压力，所以比起真正的农民来，可以稍微做少一点，做慢一点。但是尽管如此，也远比在学校农场劳动强度大。

有关“学农”的一些“悲摧”记忆

最为“悲摧”的是不定期地到农村劳动，这种劳动的时间和地点不确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早晚饭在学校吃，相关生产队只提供午饭，也就是说，基本上自己吃自己的饭，跟人家做事，用我们老家的土话来说，就是“吃家饭，屙野屎”。做事当然不能够偷懒，因为我们劳动的组织形式和农民的生产劳动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挑土，两人挖土，若干人肩扛扁担，扁担上系着两只篾箕，按照一定的顺序担上土块，沿着一定的路线将土块挑到一定的区域倒下填埋，你想偷懒，可能吗？有时候，上方还硬性规定任务，不干完，不能回去，你偷懒行吗？插秧虽然是更具个体性的劳动，但是一群人同在一块田地上插秧，如果你插得慢一些，可能马上就有人关你的“笼子”——旁边的人用插好的秧苗将你团团围住。入了“笼子”，要出“笼子”就不是那么方便了，如果不是十分小心，会踩坏人

家刚刚插好的秧苗。所以，像这类劳动，大家得特别卖力，生怕落后。同时为了鼓励大家多干点事，校方还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支农劳动搞得好的可以受到表扬，得到表彰，比如评为先进分子或积极分子，所以大家干事铆足了劲，要力争上游，也就是要力争受到表扬，拿到奖状，早日加入红卫兵，早日加入共青团。

中午时分，太阳高照，该是吃饭的时候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汉子挑着木桶，来给我们送饭，生产队已经跟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所谓“丰盛”，其实也就是饭给的充足一些，下饭的菜蔬品种和份量多一些而已，比如蔬菜就是新鲜的茼蒿、大白菜、豇豆等，还有什么盐豌豆、黄豆酱之类。肉当然是看不到的，那个时候要凭票供应，我们不能责怪人家不给肉吃。不过我们也没有吃肉的奢望，当时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就要山呼万岁了。几个汉子挑着木桶在一块树荫下停下，扁担还没有放下来，我们便迅速丢掉手中的活计，拿着饭碗蜂拥而至，将木桶团团围住，然后争抢勺子盛饭。第一碗我们往往少盛一点，很快几口就扒完了，第二碗盛到碗里后用勺子严严实实地压一压，力争多盛一点，当然也是风卷残云般地赶快吃完。再看看木桶，如果还有一点饭，就再添一点。不过，大多时间，你想添上第三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几只木桶早就被抢得底朝天了。实际上吃饭的过程就是一场战斗，斗智斗勇斗力，跟动物哄抢食物应该没有什么两样，仿佛人类又进入丛林时代！

有一次我们插了一整天秧，人人腰酸背疼，疲惫到了极点，大家都希望尽快结束劳动，回学校吃饭。想不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这个生产队的一群男劳力挑着一担担秧苗来到我们劳动的田间，他们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要我们还在这儿多劳动几个小时。何培森老师是一位要求进步的班主任，当时应该还没有加入党组织吧，我估计他还想创造条件加入共产党，所以从来不说“落后话”，事事争当先进。他看到这种情况，也不说什么，只是要求我们赶快插秧，争取早点收工。当时我们心里非常愤怒，这些人为什么不替我们想想，我们的晚饭还得到学校去吃，你们就不能够体谅我们一下？我们可是一群小孩子呀，我们不是你们雇佣的劳工！我们心里怨恨，但是都不敢从言语中表现出来。过了一阵，我们抬头远望，又看到有一群人挑着一担担秧苗朝我们走来，何老师也还是埋头插秧，似乎无动于衷，我们愤怒的心情无以复加，用鲁迅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出离地愤怒”了。这时候，只见我身旁的一个同学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将一把把秧苗踩到了泥土之中。于是大家纷纷仿效，有的同学还抬起头四下望望，趁人家不注意，顺势将身边的秧把踩入泥中；有的同学看都不看一下四周，脚碰到了秧把就往下踩。何老师可能没有注意，也可能看到了这种行为，但是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大家，然后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到暮色四起的时候，田间还散落着一把把没有插完的秧，我们才悻悻然地爬上田埂，悻悻然地回到学校。

还有一次我们刚刚收工，走在返校的路上，忽然一个骑自行车的干部模样的人将我们拦下来，通知我们说，洪湖围埂有一处溃口，洪水涌进了农田，有一部分农田被淹没，上级要求我们尽快赶到一座大桥所在的地方投入抗洪的战斗。何培森老师接到命令后，二话没说，顾不上一天的劳累，又带着我们向新的地方进发。当小跑似地赶到出事不远的地方时，只见洪湖围埂上有一处大的缺口，洪水瀑布似的汹涌澎湃，疯狂地吞噬着农田，威胁着附近的村庄。我们在桥边停下，开始了挖土和用土块装草袋的劳作，一部分人挑土填实桥下的河床，一部分人将装土的草袋拖到桥下的河水中垒成一道抵挡洪水的大坝。不久附近的农民也担着箢箕参加我们的劳动。从日落西山到第二天旭日东升，我们干了整整一个夜晚，才将拦截洪水的堤坝构筑成功。洪水慢慢地靠近堤坝，但是它被堵截在这儿，不能肆虐了。干了一天一夜，我们已经很疲倦了，但是一种成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劳动中有一件事情值得一记——在工地上主持其事的公社武装部侯姓部长殴打一位农民。当时正是我们紧张劳作的时候，只见附近有一阵高声大喊的声音，定睛看时，只见这位侯姓部长一把夺过一位农民肩上的扁担箢箕，甩在地上，一把将他撂倒在地，然后用膝盖顶住他的肚皮，左手按住他的肩胛骨，右手用拳头猛揍他的脸部和胸部，活生生一幅“武松打虎图”。只是这只“虎”没有一丁点“大虫”的雄风，他不敢出声辩解，也不敢自卫，任由部长殴打，而侯部长却俨然是武松第二，豪情万丈，气势如虹。他边打边骂道：你这个混蛋，他妈的，你知道什么时候，你还犯贱？你看看人家学生都在好好干事，你还说怪话不？旁边的农民一个个望着，也没有人敢于去劝阻。至于这位可怜的农民说的是什么怪话，我当时还不清楚，我问过我身边的同学，他们也说不清楚。等到这位侯姓部长累得满头大汗，站起来伸直身子，摊开两手，气喘吁吁，无力再打的时候，这位农民才爬起来，然后又识相地迅速融入到挑土的队伍当中。这位农民如果现在还活着，他应该有七十多岁了，不知他是否还记得这次挨党的干部揍的经历，如果还记得，是否为这件事还耿耿于怀。笔者记载在这里，目的是提供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大家看看文革时期的干部究竟是如何对待我们农民兄弟的。

1971年，洪湖县在县城新堤附近修建一座将洪湖和长江沟通的排水闸。当时的施工场面非常大，非常壮观。在工地上劳动的农民人山人海，他们都分班劳动，几个小时一次轮班，一天二十四小时施工不断人，一到晚上整个工地灯火灿烂，人声鼎沸。秋天的一个下午，学校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求我们学校派一部分学生参加当时的施工劳动。我们班的十几位同学有幸得到学校指派，到工地上参加挖土挑土的劳动，我也有幸“忝列”其中。吃过午饭后，我们便扛着铁锹和扁担箢箕列队徒步向工地进发。我们学校离工地大概有上十里的路程，一路走过去需要一个多小时。到达指定地点后，稍事休息，吃过晚饭，然后投入到挖土挑土的人

流中。由于闸基开掘很深，泥土湿度比较大，挑土时行进的道路泥泞不堪，我不知道自己挑着担子是如何跌跌撞撞走过这五六个小时的。到了半夜，应该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吧，我们该换班了，于是我们又从人流当中撤出来，返回学校。十多个同学走夜路，而且都是男同学，当然不会害怕什么，但是在我们回校必经的路上，有几户人家养了几只大狗，而且几乎都是疯狗、恶狗，白天经过那些地方的时候，令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这次晚上要经过这些地方，当然又有些害怕。我们商议，遇到狗吠的时候，我们便马上集合走成一个小方队，高声呼喊口号。当遇到第一只狗狂吠的时候，我们迅速地靠拢来，迈着正步走的步伐，脚落在地上的声音整齐划一，咚咚作响，同时高声地呼喊：“一、二、三、四”。我们扛着铁锹和扁担簸箕，仿佛是扛着战斗的步枪，我们的队伍仿佛就是昂首挺胸经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军人方阵——尽管看起来有些滑稽。那条狗本来想还在这儿狂吠几声，但看到这种阵势，转头就跑，生怕跑得不快，会被我们捉住。以后的几处地方，我们依计而行，所向披靡，这一条条疯狗、恶狗往往都落荒而逃，寂静的夜空中回响着我们高亢的口号声和爽朗的笑声。我第一次感到了团结的力量，感到了正义总会战胜邪恶！

“学农”的效果

改革开放后，学校再不像文革时期那样，让学生无休无止地“学工”、“学农”了，学生们能够一心一意坐在教室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实在是这些青年学子的大幸。当然，现在的教育又有了另一种病而且病得不轻——这是题外话，就此打住。

当年设想的通过“学农”劳动培养学生对农民的感情，培养合格的能够扎根农村的“新式农民”的目标，实际上事与愿违，基本落空。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农民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地位低下，身份卑微，没有丝毫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没有经济地位，甚至种粮食的人还免不了挨饿，而所谓政治权利也只是写在纸上，停留在口头上，是一种虚空的权利。通过“学农”，反而让学生们跳出官方宣传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类抽象概念与美好想像，清晰地了解和切身体会到了农村的真相。别说城市学生了，我们的很多农村同学都想方设法逃离农村，尽管这个过程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徒劳的。

令人扼腕的是，直到现在，农民的命运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村出身的青年人厌恶农村，厌恶农业生产，逃离农村就是明证。

【生逢乱世】

串联路上的“大雁”，你在哪里？

——来自海外的“寻人启事”

张维武

央视跨年演唱会上，才旦卓玛和泽旺多吉演唱了一首藏族民歌《远飞的大雁》：

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北京，
翻身的农奴想念恩人毛主席。

多么动听的歌声，多么熟悉的旋律，它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我终身难忘的人，不知道她现在人在何方……

这段往事发生在文革初期、一九六七年的春季，当时我们这支从上海来的中学生串联队，从成都步行去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参观《收租院》。记得那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大家背着行李，扛着红旗，行走在成都到大邑县安仁镇的公路上。途中时常会遇到往同一目标前行的串联学生们，有三五成群的，也有列队行军的，大部分是四川当地的学生，也有不少外省来的红卫兵。一旦遥遥相见，大家就会高唱毛主席语录歌，等看清楚红旗上的大字，就会相互激励高呼“向首都红卫兵学习！”“向重庆红卫兵致敬！”……虽然我们互不相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初春的成都平原下起了蒙蒙细雨，这丝毫未能减弱我们的热情，反而激发起大家的斗志。同学们高唱革命歌曲，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歌声、雨声和口号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一个个沉浸在极度的亢奋中。回想起当年，为什么大家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反而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呢？

雨越下越大了，而我们的雨具根本抵挡不住密如牛毛的春雨。那个年代，上海一般家庭的中学生很少有穿雨衣的。在出征前的筹备工作中，我们去当时南京东路四川路口的中央商场，一人买了一个装化肥用的大塑料袋。回到家中，将口袋长的那一边剪开，往头上一盖，就成了一件既便宜又实用的“长征雨衣”。其实这种自制的雨衣挡个毛毛雨还凑合，如果遇上大风大雨就无济于事了。行

军途中偶尔碰到几个穿军用雨衣的红卫兵，用现在的网络语言可称之为“雨衣哥”，真不知会羡慕死多少个红色“背包客”呀！

雨下个不停，南方的春雨尽管不是狂风暴雨，但是连绵细雨足以把我们淋浇成了落汤鸡。行走到半路，远处隐隐约约看见了一座大平房，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到里面去避一下雨啊！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座极其普通的生产队仓库，当我们兴冲冲地跑到门口，从屋里飘出了一阵无比深情悠扬的歌声：

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
捎封信儿到北京，
八二六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

进门一望，里面已经挤满了避雨的步行学生们，大家正在聆听一位女红卫兵唱歌。这是一位中学生，系着两根短辫子，她那衣着朴素的外表，掩盖不住四川妹子特有的那种姣好的容貌。她的演唱显然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那歌声就像是一股未经污染的清泉，涓涓细流，轻轻缓缓，如此真诚、如此淳朴，流进听者的耳中，直灌人们的心田，我被这天籁之音震撼了。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支歌，不知道这是首什么歌，但是旋律告诉我这是一首藏族歌曲，而我最喜爱西藏民歌了。1958年底，才旦卓玛到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王品素教授，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响彻祖国大地。打那时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才旦卓玛的歌，凡是她演唱的，每一首歌我都喜欢听、也喜欢唱。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我就是一个“藏歌控”，或者叫“才旦卓玛粉丝”。

女红卫兵的歌声正在倾诉一种情感，一种对领袖的热爱和思念。但是在这激情的深处，我仿佛感受到大雁的悲吟，犹如《诗经·小雅·鸿雁》中所描述的“鸿雁于飞，哀鸣嗷嗷”。我喜欢那种清亮中带些许忧郁些许惆怅的曲调，轻轻哼起，虽没有慷慨激昂，反而有一种催人泪下的情怀。她一唱完，我就大胆地走上前，夸奖她唱得很好，并请教她这是一首什么歌。

“我不晓得吔。”她用浓郁的四川口音答道。

“那你从哪儿学来的？”

“大家唱，我也跟着唱，就学会了。”她腼腆地说。

“能否请你再唱一遍，唱得慢一点儿？”我恳求她。

她看了看我，抿着笑将头转过去，又轻轻地哼了起来。记得当时她一共唱了两遍，我边听边将音符和歌词记了下来。记完后请她校对一下，她看了一眼笔记本，害羞地说了一句：

“我不识谱子。”低头走开了……

不久，仓库里发出了一阵骚动，原来雨终于停了，为了在天黑前赶到《收租院》，大家一窝蜂似地冲出了仓库。我们又行进在被雨水冲刷过的公路上。雨过天晴，空气清新，在夕阳斜照下，大家的心情格外舒畅，当时的情景真可称之为“一路斜阳一路照，一路歌声一路笑”。途中，我把刚记录下来的曲子，一边练习、一边用四川口音学给同学们听，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谁知就在这时，刚才那位《远飞的大雁》出现在我们眼前。

“你们是从上海来的吧？”她笑着问我。

“你怎么知道的？”我不好意思地问道。

“那红旗上不是写着了吗！”她还问我是怎么学的简谱，我告诉她是姐姐教我的，并反问她是怎么学的这支歌。

她自豪地答道：“我们那里，每一个人都会唱这首歌。”

“为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嘎……嘎……”此时空中传来隐隐的雁鸣声，她仰首望去，轻轻地说了句：“你听说过万县的‘2·22镇反’吗？”她那深邃的双眼，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寻问苍天。

原来她是四川省万县市（今属重庆市万州区）的中学生，文革中他们那一派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在二月二十二日那天遭到武装镇压，死了不少人。于是，她们就传唱这首歌，希望歌声能飞到北京城，期盼着有人来解救他们。当时，我从未听说过文革中有开枪打死人的，虽说各地出现了两派组织，但还没有对立到武斗，所以我对她的讲述半信半疑。

她用悲怆的语调对我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她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万县“2·22镇反”事件的经过，并告诉我，当时有一个好像是北京来的红卫兵，中弹后用伤口上的鲜血在墙上写下“我是革命的”几个字，然后倒在血泊中。言语之间，她一直在竭力克制内心的悲痛，但是最终眼泪还是夺眶而出。我记得泪珠停留在她那白皙的脸颊上，她没有去擦，只是抬起头，双眼无助地望着远方……后来她是什么时候回到自己队伍中去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当时大家的心情都万分沉重，一路无语，不知不觉地在夜幕中走进了刘文彩的大庄园。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始参观《收租院》。当时究竟看到些什么，时隔半个世纪，印象已经模糊不清了。只记得刘家庄园很大，深宅大院。记忆中最清晰的，就是《收租院》里的那只斗，据说这就是忆苦思甜里常提到的“大斗进，小斗出”的剥削农民的斗。另一个，就是那黑幽幽的水牢，既阴森、又恐怖，看了使人终身难忘。其它的，已经记不起来了。老实讲，记忆模糊的原因不是

时隔已久，而是当时的我根本就“人在心不在”。

自从与她分手以后，我的耳边总是回荡着《大雁》的旋律，眼前总是呈现出她那张美丽的挂着泪珠的脸，整个人变得心神不安。同学们开始笑我，说我在串联中遇到了“红色恋人”，还跟我打听她的姓名，是哪所中学的？我说我压根儿就没有问这些，大家又责怪我，说我太笨，谈了半天怎么连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我也开始自责起来了，怎么没有问她的姓名呢？后来一想，反正明天大家都会参观《收租院》，到时候我一定会找到她的。想到这里，一天的疲劳都烟消云散了，一心只盼着天赶快亮。

第二天，为了找她，我把刘家大院里里外外走了个遍。人家是在看景观物，而我只盯着人群看，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着我的大雁。从早上到天黑，走遍了刘家大院各个角落，就是见不到她的身影。同学们见我一无所获的样子就替我出主意，说我这是在“大海捞针”，应该换一种策略，叫作“以歌会友”。于是大家陪我一起去住宿处的女生宿舍，对着门口高唱《远飞的大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唱，一直唱到人家将我们赶出来，还是没能把她唱出来。最后，我在万分失望的心情之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成都。

当我们结束串联返回上海以后，各地的造反派组织日益对立，从文斗演变到武斗，从四川、湖南蔓延到全国各地，武斗之风最后吹到首都、吹进了高等学府。一九六八年，北京清华大学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百日大武斗”，其间有人被打死。消息传到妈妈耳朵里，她担心姐姐在清华的人身安全，叫她赶快回上海。

姐姐回上海期间，我向她讲述了串联中的所见所闻，还自豪地给她唱了学到的那首“红卫兵的歌”。听完以后，姐姐笑着说，这不是什么“红卫兵的歌”，这原本是一首藏族歌曲，歌名叫《想念毛主席》，但是人们更喜欢称它为《远飞的大雁》或者《南飞的大雁》。遗憾的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至今不详，也无从考证了。这首歌在文革前后成为一首广为流行的曲子，但是词和曲流传着很多不同的版本。姐姐说，她记忆中最早的歌词大概是这样的：

南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
捎封信儿到北京，
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

听完姐姐一席话，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唱的是山寨版啊。尽管知晓了这首歌的来龙去脉，但是每逢唱起它来，我还是习惯地将它唱成“八二六战士”，至今改不过来。我在想，这或许就是人们传说中的那个缘分吧！因为这首歌里

有一个血色浪漫的故事，而故事中有一只“远飞的大雁”。

随着时代的更替，这首歌似乎慢慢地被人们淡忘了，可是对于情有独钟的我来说只是深深地埋入了心底。

光阴如梭，弹指一挥间，如今才旦卓玛的一曲高歌，又令我回想起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愈加思念我心目中的“大雁”。这五十年间，无论是在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校园，还是身处太平洋的彼岸，我心中时时会发出呼唤：

“远飞的大雁呀，你现在生活得好吗？”

我在想，或许你曾去了云南插队，如今回城甚至下了岗；或许你并没有回城，而是毅然去缅甸参加了游击队；或许你没赶上插队，早已在文革的武斗中悄然离去；或许你考上大学、如今是一位成功人士；或许你也来到美国，在硅谷的某个角落，我们曾经擦肩而过，却又互不相认……

感谢才旦卓玛的歌声，她激活了我的记忆，我要将这段经历发表在网络上，如同刊登一则《寻人启事》，去寻找那位串联路上的女中学生。我知道光凭这些有限的资料要找到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我应该将这段往事说出来，通过网友们的传阅，或许有一天会传到国内，传到四川，甚至传给她当年的同学，或者她的孩子。因为这不是虚构的故事，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一段难以忘怀的青春。我坚信：只要我们这一代人还健在，只要人们还没有忘记我们的过去，我一定能够找到她！

远飞的大雁，你在哪里？

【忆旧思亲】

师友从今少一人 ——痛悼杨世元老师

何 蜀

杨世元老师走得太突然。在2月26日下午他儿子打来电话，哽咽着告知他父亲已被送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时，我真是大吃一惊，因为在一天之前我还跟杨世元老师通过电话，向他请教重庆市文联文革历史中的几个细节。他精神很好，侃侃而谈，一口气跟我聊了二三十分钟，一点没有病像……

认识杨世元老师，是我在1989年春参与创办《红岩春秋》杂志以后，当时他已经在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家已从重庆市文联搬去成都多年，但因他与我们杂志两位创办主持者（先后两任主编）胡康民、李畅培的友谊（他与胡康民是1949年之前在民国陪都闹学潮时的“新青社”战友，与李畅培是文革后期开

始一起调查采访现代革命史见证人的搭档),也因他对重庆地方党史的长期调查、研究,仍是重庆党史研究和写作的主力,也就成了《红岩春秋》杂志的重要作者。不过,在我成为他文稿的编辑之前,早在文革后期,我就已经知道他的一些情况,



主要是听当时还在重庆市博物馆的李畅培老师经常提起他,讲到他俩调查搜集现代革命史料中的一些事和杨世元的一些见解,特别是对《红岩》作为中宣部所称誉的“党史小说”,从党史角度提出的一些质疑,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杨世元老师已被借调到歌乐山烈士墓展览馆协助工作。许多年后,我才了解到他怎么会离开文联去烈士墓展览馆的原因。(左图:杨世元先生遗像。)

“革命会吞噬自己的儿女”已经被证实是一条历史规律。革命还会逼使、促使一些曾经忘我投身革命而没有被吞噬掉的幸存者走向质疑、反思革命,这也被众多“两头真”老人的人生道路所证实。

杨世元老师比“一二·九”那一代的“两头真”老人年纪要小些,是国、共内战的最后阶段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二条战线”上的学生运动骨干。他们那些青春年少的中学生,狂热地追随中共“闹革命”:争民主,要自由,闹学潮,骂政府,游行示威时一人领呼:“背时政府——”大家一齐狂吼:“垮!垮!垮!”豪情万丈地高唱“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他常说自己就是王蒙所自豪的那种“少共”。也因此,号称“人民政府”的新政权建立后,他就被作为可靠的“少共”选派到重庆市文联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邵子南(后任西南文联副主席)身边做秘书,邵子南病逝后,他又给中国作协重庆分会(西南大区撤销后由西南文协更名)主席沙汀当秘书,从此走上文联工作岗位。

正因为他的“时刻听从党召唤”,自认为是党的“近卫军”,所以成为重庆市文联五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的依靠力量。作家黄贤俊被打成“反革命”之前,文联党组是派的他去四川省政协秘密调查黄贤俊在政协会议上要求共产党拆除安装在其头脑里的窃听机器一事;“反右派”运动中,他自然是冲锋在前的“小钢炮”。于是,在1957年《重庆日报》副刊组“全军覆没”被打成“右派”之后,他就“临危受命”被党组织作为可靠的“左派”指派到副刊组“占领阵地”,直到文革前不久在他再三要求下才调回文联。

不料,这段“革命”经历,却为他文革时的命运荒诞剧埋下了伏笔。

文革爆发前夕,1965年10月,按照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和文化部与全国文联整风的精神,各地都在着手“重建工农兵文艺队伍”,重庆市文联党

组派时任业务组组长的杨世元到重庆钢铁公司、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空气压缩机厂、江陵机器厂、民生机器厂等国营大企业去对工人业余文艺队伍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接着，就在姚文元那篇点燃文革导火索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时节，杨世元又奉命带队，率重庆地区由市委宣传部审查挑选出来的几个工农业余作者和业余文艺骨干，到北京出席了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大会结束时，文革序幕已悄然拉开。他们载誉归来，只以为自己将挑起党交给的开创文艺新纪元的重担，一个个好不踌躇满志。

然而这一次杨世元却进不了“近卫军”的队伍了。文革初起，各地纷纷拿报纸的副刊开刀祭旗，按中央批判“三家村”的模式，把副刊统统打成“小三家村”。尽管杨世元早已离开《重庆日报》副刊组，却仍然脱不了干系，特别是副刊组1962年春节给作者发出的一封约稿信，已被定为重庆“三家村”反党罪证之一，而那封约稿信正是他起草的……尽管他对调查人员再三说明那约稿信与副刊组组长（已被定为“三家村”成员）无关，而是按报社总编（已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全市宣传口工作组的总负责人）的指示写的，并且拿出当时的笔记记录为证，也无济于事。宣传部派出的工作组，当然只能按宣传部定下的目标整人。他这个重庆市文联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党组会议的忠实记录员，就再也不能成为以往政治运动中那样的依靠对象，而成了接受审查和批判的“黑帮爪牙”。

在革命中，人的命运往往变幻莫测。本来按杨世元的人生路径，在文革初期理当是坚决保卫党政领导的“保皇派”。可是没想到会因《重庆日报》“三家村”一案牵连，失去了“保”的资格，这是他内心深为不服的。他当时暗自认为：如果我都成了三类（批判教育对象），那你们肯定是四类（打倒对象）。因为他根红苗正，政治历史上没有一个疤，而小小的重庆市文联机关二十几个在编人员中，那些按照工作组的调子群起而对他进行批判声讨的人中，许多都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或“出身问题”。因而工作组组长牛文都摇头感叹：连杨世元都有问题，文联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按照一般的逻辑，像杨世元这样在文革初期“五十天”里受过工作组打压的人，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应当成为造反派或至少得到造反派的“解放”。可是，当时在重庆市文联率先扯旗造反的，是因小说《红岩》这部“红色经典”而成名的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这个三人创作集体。何况罗、杨二人还得到过“文革旗手”江青的“亲切接见”、赠送“毛选”，江青当时既组织改编《红岩》为“革命现代京剧”，又许诺要将《红岩》重拍成彩色电影（已拍成的黑白电影《烈火中永生》她极不满意），还关照他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改好小说《红岩》——《红岩》的修改有最高领袖“江姐不能死”之类“最高指示”。而

罗广斌等人造反后，为了摆脱在小说创作中和改编电影中与“文艺黑线”的头头脑脑们（周扬、夏衍、林默涵、陈荒煤、马识途、沙汀……）纠缠不清的可疑关系，就非得表现出与“文艺黑线”势不两立坚决斗争的姿态，因而对文革初期遭到批判的“黑帮”、“黑线”人物不但“不准革命”，还要继续批判，并且在向外来红卫兵宣讲重庆市文联“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时候，大讲他们如何与文联的“黑帮”、“黑线”斗争而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实际上，工作组时期罗广斌等人都是依靠对象，而且对所谓“黑帮”、“毒草”的批判正是他们的调子最高）……这样，罗广斌、杨益言凭借《红岩》的影响和慕《红岩》之名从各地蜂拥来到重庆市文联的大中学生、红卫兵的支持，在文联机关率先夺权——以所谓“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选出文联文革小组，选举时，文联机关的“黑帮”2人、“黑帮爪牙”4人（包括杨世元在内的党员中层干部）及“摘帽右派”2人共8人被剥夺了选举权（约占文联机关在编人数三分之一），在由文联炊事员（号称工人领导）挂名任组长、罗广斌等人实际控制的文联文革小组（后被称为“罗氏文革”）的一百天执政期中，几个“黑帮”和“黑帮爪牙”继续被监督劳动。罗广斌代表重庆造反派上京告状后于1967年1月11日归来当天宣布学习北京实行“红色恐怖”，他们还被抓到文联礼堂里跪“满堂红”（当然这类事文联的人都是不出手的，自有驻文联的“革命小将”出手）。杨世元挨过打，他的家门上还被“罗氏文革”支持的一些文联家属小孩组成的“小闯将杀杀杀战斗队”（追随罗广斌造反的一位诗人是这些小闯将的“辅导员”）贴上了“黑帮二把手”的黑榜。

那么，杨世元应该因祸得福了，在文革结束之后应该因受到过造反派的打压而扬眉吐气了……可是又不——世间事就是这样诡异：

因为罗广斌等人参加造反后卷入了重庆造反派两派的冲突而且陷得很深，罗广斌成为反对重大八一五这一派（后称反到底派）的旗帜，当罗广斌被抓走并在关押地自杀身亡后，杨益言等人逃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并在首都红代会一些红卫兵支持下，在北京大造舆论，控诉重庆已经“资本主义复辟”，罗广斌是被“谋害”死的……八一五派为了对付反对派的宣传攻势，需要组织对罗广斌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批判，于是，杨世元就被找出来，让他参加了这一工作，但不能公开出面，外出调查的介绍信上都不写他的名字（以免被对方抓住“使用坏人”的把柄）。他就因此而成了一个特殊的“造反派”（按我对重庆一百位造反派人物的分类分析，他属于“因反对造反派而成为造反派”一类）。又因为他的文笔犀利甚至有时过于尖刻，在批判罗广斌当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然在文联结怨甚多（因文联机关多数人员是追随罗广斌造反的反到底派）。所以在文革后期的“群众性整党”中，杨世元久久不能“恢复党组织生活”（“群众通不过”）。到了文革结束并被“彻底否定”之后，小说《红岩》依然是“红色

经典”和重庆市在1949年以后唯一拿得出手的长篇小说，罗广斌、杨益言在文革中的造反、夺权经历便被忽略不计进而不为人知了——从文革后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至今，罗广斌的名字都一直与老舍、田汉、赵树理、傅雷、叶以群、闻捷等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笼统而含混地称之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而杨世元则被指责为参与过迫害罗广斌的“造反派”——其实重庆市文联机关当时除了副主席邓均吾和秘书长王觉两个被批判为“黑帮”的当权派之外，没有谁是置身于两派之外的“逍遥派”，只不过几个被打成“黑帮爪牙”的党员中层干部除杨世元外都不敢参加实质性的组织活动，只是因相信跟解放军走没错而站到了驻军支持的八一五派一边。

因为这样，杨世元后来难于在文联立足，不得不设法借调到烈士墓展览馆去参与恢复展览陈列的相关工作，也因此从文学转入了现代革命史，告别了他从追随沙汀时就有的文学梦。直到他调去成都许多年后，重庆市还有人以为文联的造反派就是杨世元。（右图：文革后期1976年春杨世元〔左〕与文联老友张继楼一起出差了解外地有关革命文物展览陈列恢复情况时在北京留影。）



杨世元老师经常说，罗广斌在文革中的悲剧就是“从革命到‘革革命’”。其实他在文革中的命运荒诞剧也是一样。

罗广斌幸运的是死得早，没有按其在文革中的行为轨迹陷得更深走得更远——如果那样，结局可能更糟，不是像部队作家金敬迈、李英儒那样被打成“五一六”投进秦城监狱，就是像内蒙作家乌兰巴干那样在文革结束之后被清算参与迫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的罪行而判刑入狱……正因为罗广斌死得早而且被造反派中的一派当作“叛徒”和“黑线人物”猛烈批判过，所以他的名字有幸被列入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大会主席团建议“对长期奋斗为我国革命文艺事业作出优异贡献，因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而逝世或身后遭到诬陷和凌辱的文艺战士们，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怀念”并全体起立默哀的那份长长的名单中，罗广斌排在“著名作家、诗人”名单中的第22位；而曾经被罗广斌当作“文艺黑线”在重庆的代表人物和“黑帮”进行猛烈批判，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含冤去世的重庆市文联副主席、老诗人邓均吾，排在同一名单中的第33位。

离开了文联那个“是非之地”的杨世元，在改革开放年代有了对“革命——‘革革命’”进行反思的条件和机会。在不断的反思中，他写了一篇篇内容丰富、

思想深刻而且文采斐然的文章（发表时大多用的是他的常用笔名甘犁）——

他写了《弄潮儿向潮头立——刘弄潮传奇》（发表于《红岩春秋》2006年第四期，署名甘犁），记叙这位传奇老人从二十年代初即在四川参加建团组党，先后被吴玉章、李大钊派为代表，几经磨难后参与解放军接管清华大学并创建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竟被康生点名定为“极右派”……文中写道：

1979年四次文代会召开，巴金、阳翰笙、任白戈、沙汀、艾芜、陶钝、王云阶等齐聚北京，他们得知刘弄潮尚在清华大学，只是多年磨折，已限于行走。就在陈毅经常宴请外宾的四川饭店办了一桌川菜，将刘弄潮从西郊接来相聚。这是一次“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聚会，他们这一辈人无不具有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献身精神。然而莫名的龙卷风却刮得来“山河破碎风飘絮”，战友们或为屈死冤鬼，或为牛棚活鬼，骤然重见时不免会想起肖军在四次文代会上所说的那句话“出土文物”，但他们却说，出土诚然是出土，但却非什么“文物”，而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子，他们还要争取时间，为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努力做事，重绽出中通外直，香远益清的君子之花。

他写了《几度风霜标红梅——侧记谢韬》（发表于民间电子刊物《巴山夜雨》2010年9月15日第三期，署名甘犁），文中写道：

2003年春谢韬住在成都，“非典”肆虐期间，突然得到老友李慎之在京逝世的噩耗。李慎之曾为社会科学院领导人，然而他晚年最大的愿望却是当一个“公民课教员”。现在这位正待行课的“公民课教员”放下了教鞭，未完的教材谁来编？空缺的讲台谁来顶？震惊与悲痛之余，谢韬在因疫情返京不便的情况下，寄去了一诗一联寄托哀思。其联语是：

六十年友谊，君才非凡。秉直言，难容当世。廿二年极右分子折磨，爱奴才不爱人才。

半世纪风云，历史教训。批极权，大得人心。三次陪三位总理出访，是国士不是谦士。

“是国士不是谦士”，这何尝不是谢韬的自我写照！1944年的锦江河畔，1945年的釜溪河畔，1946年的嘉陵江畔，谢韬和李慎之是为民主而呼号的子座双星。建国后，又同为追求民主理想而遭难，好在劫后重逢，彼此壮怀依旧，赤心不改。为了人民民主事业，仍然是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写了《上鞍杀贼下鞍诗——刘传菊传奇》（发表于《红岩春秋》2005年第

二期，署名甘犁），记叙了这位 16 岁就参加革命，才气纵横屡建奇功，却又刚直遭忌身陷冤狱 15 载的老公安的坎坷人生，感叹道：

谁知他的能文能武却遭到了觊觎权位者的嫉视。“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已像文人宿命似地悄悄向他袭来。而无产阶级专政又是一把刀子，“刀把”其实也是“权柄”，如果革命阵营内部权力结构有所异动，出现了“权力究竟掌握在谁人手里？”这样尖锐的问题时，“刀把”就可能为这样的命题服务，从而刀尖转向，杀向自身。

他写了《一篇未写出的文章——怀念老同学、老战友胡康民》（发表于《红岩春秋》2008 年第二期），回忆了他曾与胡康民一起商定写四川党史上被称作“长衫子党员”的一桩旧案：一批从大革命时期就追随中共投身革命的老知识分子、老地下党员，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高，门生故旧遍蜀中，社会关系复杂，在中共执政之后被视为“党内的高级民主人士”而作了“淡化”、“消化”处理，有的被抹掉党籍，有的被抹短党龄，有的甚至被“劝退”出党。对此，他联想到新政权建立之后：

随着运动来势一次比一次更左，即使我们这样以“子弟兵”自命的人，也渐渐地觉得不那么对头了。比如，地下党时期的领导人赵隆侃、刘承才这样的同志，他们当年出生入死的斗争经历，曾使我们十分敬仰。建国后他们作起宣传鼓动来，又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打动人心啊！可是他们却在整风运动的号召中因言贾祸，跌入深渊。我们这些昔年的追随者能无困惑？能无惶惧？再后来，“民主”与“知识分子”都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到了文革，更是成了要专政要消灭的对象。……“长衫子党员”问题，是民主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涉“民主”第一案。对于民主革命和民主建设的普适性，在我们这辈人心中是从未怀疑过的。在专制政权方死，人民政权方兴的时候，神圣的“民主”怎么会由光环变成了荆冠呢？

他写了《修当代史也要有〈酷吏列传〉》（发表于《巴山夜雨》2011 年 11 月 10 日第十一期，署名甘犁），介绍了主持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工作的老干部彭塞提出的一个重要设想：“修当代史也要有《酷吏列传》”，期望通过探索，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党史人物列传开出生面并有所突破。他按彭塞安排，先去调查了涪陵地区丰都县大饥荒真相，了解到当年“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情况已经无法掩盖之后，经省委批准，处分了一批干部，将必须问责的县委第一书记、县委副书记、

县委农工部长、县公安局长四人逮捕，并经过法庭公审判刑，以息民愤。然而入狱四人以“执行”责任作申诉，经地委复查后上报省委，得到了改判，经涪陵地区丰都法院和中级法院两级重审：“原判事实属实”，“撤销原判”，二人免于刑事处分，二人宣告无罪。面对如此令人无语的案例，该怎样下笔？彭塞只好将撰写“酷吏列传”的计划暂时搁置。文章最后充满激情地感慨道：

……只是他在位时已是满头银发，到七十岁离休后，“直吏”、“廉吏”与“酷吏列传”等课题就悄然搁置了。对于计划要拿下的史学高地没有攻克，彭老显然心有未甘。2002年春，彭老因病去世。我这时听到一件事，在有次干部聚会上，有领导亲切致词：“祝老同志们健康！健康！健康！在职干部们高升！高升！高升！下海同志们发财！发财！发财！”彭老在感慨中竟大发伏枥之嘶：“我们人民遭了1957年的‘阳谋’，大跃进的惨烈牺牲，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等等，为什么大家不深思！深思！深思！灵魂深处不清扫！清扫！清扫！”在感愧中，也就深感彭塞未竟之愿是留给我们的遗嘱。

他思考得更多，跟我聊得更多的，当然是他在其中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文联。他先写了《“焚琴煮鹤”诗案——老诗人邓均吾之死》，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顾了重庆市文联文革史上极有研究价值，却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不敢正视的第一冤案——从工作组到造反派再到工宣队、革委会都目标一致地“痛打落水狗”，以一首仅仅28个字的七言绝句诗作为“反诗”、“黑诗”上纲批判，最终将老诗人迫害致死。他曾将文稿交给文联一位老友，想在其主编的一个诗歌与诗评内部刊物上发一下（他估计很难通过，但想试试看老友的反应），老友略一翻看打印稿，便叫苦道：“哎呀世元，我要活！我们刊物要活！……”然后拉他“走走走，还是来学习108号文件”（打麻将）……最后是我征得他同意，将此稿推荐到海外的网络刊物《华夏文摘增刊》393期《文革博物馆通讯》229期（2004年9月6日出版）上发表了。他在文章最后写道：

一个地方要出了交通事故，交通管制部门就得赶紧出现场，对事故车拍照，请目击者出证词，认真查找肇事原因，从而才可以警戒后车不蹈覆辙。1966年的诗画案，是在天下大乱时发生的。鉴这样的大乱，不提向社会，使后来者警觉，能知殷鉴之不远，能弭祸于未发吗？

1946年，邓老有首《自题》诗是这么写的：“生来不具奴性，自审亦非英雄。收拾万千矛盾，将来做个沉钟。”温读邓老的这些诗句，不由就想起浩劫后坚持写《随感录》的巴金老人来。他倡议成立“文革博物馆”，如一时成立不了，至

少过来人也要学会说真话。坚持说真话。巴金是这么说的：“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往事聚在一起，将铸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我根据他多次口述整理了《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发表于自办的电子刊物《昨天》2012年6月30日第6期），他在审定、修改时，特地加写了前边一节《先从文联与宣传部的关系谈起》，其中谈到：

文革后，邓小平有对文艺创作不要“横加干涉”的指示，那么，“竖加”呢？其实，无论横竖，只要杀伐决断的权柄有一只手掌控制着，即使悄然站在文坛之后，也可以通过文联及其协会为文艺创作导向，实现党政部门所期求的“指向哪里打向哪里”。

经过一次次“运动”，一批批人被整下去，文联的领导，就学会了看宣传部的眼色。宣传部的人来参加文联的会，一般是不发言的，只带耳朵来。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像江青说的，是文艺战线上的哨兵。专门睁大眼睛看文艺界有什么敌情，他们一来，文联的人就紧张，就怕。久而久之，宣传部与文联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猫鼠关系。

他意犹未尽，又写了《〈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补述》（发表于《昨天》2012年11月30日第11期），其中写道：

文革是亿万人受难的历史浩劫，实在不该在时下的尘嚣中作尘封，必须多人多侧面地来谈，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见其本然。也只有历史地具体地识得本然，才能近于事实准确、评价公允地知人论世，进而识得所以然，以免历史的错误重犯。如果心态仍如刍狗，高蹈一些是“一看二慢三通过”，低俗一些是“国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将”，一旦在一定条件下文革又再来一次，恐怕就有更多的牺牲要供上祭坛了。

杨世元老师是有良知、能反思的人。我曾反复向他追问文联当年事，刨根究底，百问不休，他总是知无不言，百答不厌，从不避讳，从不躲闪。讲起当年那些曾经被他以党的“近卫军”姿态狠批过的老作家如黄贤俊、刘盛亚、温田丰、李南力……他总是充满同情和惋惜，他曾对我多次讲过黄贤俊的冤案，讲过黄家与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关系（我曾建议他写一篇“中国最后的无政府主义

者”)……当年在重庆市文联被打成“右派”的“红小鬼”出身的诗人孙静轩，晚年与他成为好友，还把最后那首犯忌的长诗打印稿送给他。流沙河的“钦定大右派”罪名要推翻时，涉及到一个“杀父之仇”的疑案细节，是他出面为之作证，澄清了真相。流沙河书赠他的条幅上称之为“窗兄”，因他们曾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同窗”。当他听说当年在文联党组书记任上被打成“右派”的老干部龙实跟我有联系时，主动提出要我陪他去看望龙实（那次同去的还有张继楼老师），在四川美术学院家属区见到已经离休的龙实老人时，杨世元恭恭敬敬称呼“龙实同志”，说了一些为当年的无知言行表示道歉的话。龙老本来听我说起杨世元想



去看他时，还以为我不了解文联的那段历史，提醒我说：“杨世元反右的时候积极得很哟！”见面恳谈后，真正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大家都很高兴。（左图：杨世元夫妇近照。）

我特别敬佩的是，杨世元老师在整理他的藏书时，发现了一些文革中的笔记本和会议记录本，那里边都有他当时的一些或许“违心”或许并不违心但却在重读时会为之汗颜的发言记录，他却毫不在意，都交给了我，叫我拿去研究。当我把其中一册 1966 年 7 月工作组领导下的文联会议记录整理录成电子文本准备在自办刊物上发表时，他特地为之写了《1966 年 7 月重庆市文联会议记录转录版题记》（发表于《昨天》2014 年 12 月 30 日第 45 期），语重心长地写道：

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最大遗害，倒不在什么脱了裤子割尾巴，而是荼毒心智。过去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诚然是过誉了。但作家要关心人，关心社会改革，关心国民性的改造，实实在在是富于良知血性的好传统。然而一刀复一刀的批人性论，批人道主义，批三十年代，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就不仅是革面，而且是剜心了。劫中的文联，斗兽场化了。劫后的文联，石漠化了。劫中的文联人，角斗士化了。劫后的作家诗人，势所难免地要乡愿化了。

去年我把熊小凡老师（改革开放后任《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文学编辑）生前遗留下来的文革中多份检查交代材料录成了电子文本，我对其中提到的一些我不熟悉或不了解的人和事向杨世元老师请教，他都尽其可能地作了解答，他还给我讲起了当年他和熊小凡分别代表文联这个小小机关

中的两派谈判大联合的趣事，他讲到第一次谈判破裂（因熊小凡所代表的反到底派有人当着主持谈判的军代表的面抓走了八一五派这边一个中层干部），不欢而散后，他请熊小凡一起去附近饭馆（他们谈判是在两派控制范围的中间地带文化宫）吃顿饭，想在吃饭时说明自己并没有参加“尖兵”（文联的八一五派组织，只有四个成员）及为什么“尖兵”要推他做谈判代表的原因，但熊小凡可能怕影响不好或者是“拒腐蚀”而拒绝了他的邀请；后来终于达成大联合，八一五派的人都回到文联机关了，有一次他有了机会对熊小凡说明自己并没有参加“尖兵”，熊小凡正色道：“你没有参加组织，比他们参加了组织的人派性还强！”显然是指他写的那些杀伤力极强的批判罗广斌的文章。他对熊小凡的为人十分尊重，认为他即使写检查交代也是客观实在的，决不会瞎编乱说。他还十分同情熊小凡在文革前为“家庭出身”问题而长期受到排斥，反复申请入党而得不到批准的遭遇。文革初期熊小凡因“大资本家出身”而被官办红卫兵抄家后（当时文联只抄了熊小凡和“摘帽右派”李南力两家），他曾冒着危险去看望熊小凡（当时他也很有可能被抄家）。后来他调到了成都，熊小凡夫妇到成都走亲戚时，也专门去看望过他……我建议他写一篇回忆熊小凡的文章，他爽快地答应了，可惜还没有来得及写成……

他没有来得及写成的东西还多。他离去之前正在撰写的《吴玉章传》还剩下最后一章没有完成。他还有不少应该写出的东西。（下图：杨世元去世前在重庆儿子家中赶写《吴玉章传》。）

在现代文学史方面，他写过《聂绀弩在重庆》、《张恨水在重庆》、《文侠邵子南》、《山高水长——缅怀许寿裳先生》……特别是那篇《谢谢保长——沙汀创作趣闻》（发表于《红岩春秋》1993年第四期，署名甘犁），生动地记叙了沙汀当年如何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受到启发而灵感爆发，一口气写出了那篇《在其香居茶馆里》。我一直认为，要读或要讲《在其香居茶馆里》，都应同时读读他这篇《谢谢保长》，才会对那篇小说有更深入的理解。他对邵子南为什么不愿把自己原创的反对迷信的《白毛女》改变主题，以及邵子南怎样像磁石般把重庆文化艺术界的老作家老艺人们团结在周围，要不是因病早逝很可能会因其作品的“自由化”倾向而难逃政治批判的厄运；对五十年代初期刘盛亚、李南力、黄贤俊等人的小说为什么受到批判和重庆小说创作从此一蹶不振；对李劫人写四



川辛亥革命的长篇小说《大波》为什么会有民国时代和毛泽东时代两种版本，其中有哪些重大不同；对著名农业专家董时进所写的以家乡、家族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对沙汀五十年代创作上的苦闷和与省委宣传部的矛盾；对文联刊物《说古唱今》、《红岩》、《奔腾》的创刊、停刊、复刊、再停刊的折腾史……他都有很多话想说想写，可惜都还没有写出来。

在民俗和传统文化方面，他写过《年节中的巴渝风》、《磁器口琐忆》、《旧重庆磁器口人求雨》、《从“巴巫夔渝”漫谈巴文化》、《新世局的商战宣言——回顾重庆总商会楹联》……特别是那篇《落地生花说目连》（署名甘犁，《红岩春秋》2002年第五期至2003年第三期分5次连载）——我至今认为，尽管对目连戏有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但没有一篇有关目连戏的文章能像杨世元这样生动而具体地以文字再现了再也无法在舞台上再现的目连戏这份显然已经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曾给我津津乐道地聊过当年陪邵子南在做戏曲改革之前的调查研究时观看的一些后来遭到禁演的传统川剧，如《大劈棺》、《活捉王魁》之类，讲起那些剧中比“变脸”更让他震惊不已的传统特技（现在显然已经失传）……我也曾建议他写出来，可惜也没来得及写……

他很喜欢唱歌，而且因记忆好，能唱许多老歌（有一次在闲聊中不知怎么提到了为海涅诗作曲的那首德国名歌《洛累莱》，他马上就唱了起来）。李畅培老师早就告诉过我，说杨世元有个异于常人的特长：能不用唱而背诵出完整的歌词（一般人要唱起来才会跟着旋律想起具体的歌词）。他曾写过一篇回忆当年在民国陪都闹学潮时的《破晓之歌——忆“第二条战线”的战斗歌声》（发表于《红岩春秋》2004年第六期，署名甘犁），交稿子给我时，他说到在回忆那些老歌时有个意外的发现：在毛泽东时代有许多歌颂毛泽东的歌，而在民国时代，他居然没有想起一首歌颂蒋介石的歌。我也建议他把这一发现写出来……

他是个杂家，读书杂，藏书杂（他藏书中有珍本古籍，在武斗期间他逃离文联后，被占据文联大院的反到底派工人造反军总部人员撬开他封钉好的书橱，专挑易燃的线装书出来作烧煤炉引火之用了），加上在长期调查、走访、搜集现代史料中的积累，他了解许多川中名人轶事、文史掌故和野史记录，常常一聊起来就会如数家珍般地讲上许多，可惜大多没有写出来……

当然，他更多的想要写的，是对革命的反思，是他们那一代甚至上下两三代人从革命到“革革命”的历史悲剧、闹剧、荒诞剧的教训。

这一工作，只有我们活着的人继续做下去了。尽管做起来很难。

2016年3月27日改定于重庆风江阁

【故纸堆】

“工农兵”批判罗广斌

——1967年3月重庆市文联几次会议记录

杨世元 提供 何蜀 录入、注释

录入者说明：这里的“工农兵”，是文革中1967年春重庆市一个以业余文学作者和业余文艺骨干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四川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重庆团”的简称，这几次会议记录是夹在该组织一个24开软面抄会议记录本中的32开便签纸散页（共有18页）。所记几次会议的背景是：1967年1月下旬重庆造反派按中央号召在驻军支持下向市委、市政府夺权后，分裂为两大派，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主流派得到重庆驻军支持，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另一派以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和工人造反军为代表，反对革联会（后来先称砸派，后改称反到底派）；当时在重庆的外地学生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驻渝联络站支持革联会，首都一司和首都三司及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驻渝联络站则反对革联会。已经于1966年10月公开向重庆市委造反并在重庆市文联夺权的著名作家罗广斌（小说《红岩》主要作者）与他的合作者杨益言、刘德彬，在这场派性纷争中站到了反革联会一边。2月5日，罗广斌被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及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人员从重庆市文联家中抓走，2月10日在关押地（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八一楼）跳楼自杀。罗广斌被抓走次日，得到八一五派支持的四川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重庆团进驻文联夺权，原以罗广斌为首的重庆市文联文革小组和红卫兵战斗组瓦解。杨益言和刘德彬逃到北京找中央文革告状。罗、杨、刘三人创作集体被批判为“罗氏三家村”和“罗广斌叛徒集团”。随后革联会开始了“镇反”运动，3月上旬，“工农兵”在重庆市文联连续召开批判“罗氏三家村”的会议，在“镇反”的高压形势下，原由罗广斌推举为文联文革小组组长的郭清（文联炊事员）和曾经追随罗广斌“造反”的文联编辑、职工都不得不表示与罗“划清界限”，进行交代和揭发。

文中的小标题是原有的。原记录为赶上发言速度有不少文字上的省略，为便于读者理解，录入时略加了一点文字，放在方括号（【】）里表示。

1967.3.6 下午2：00 于文联礼堂

斗争坏分子张惊秋¹

张惊秋交代：

我回来写了两个材料。

罗与我是何关系，相信群众都能了解。

罗三人到文联后²，我与他们是何关系？各派都知道。我和他们没什么来往。文化革命前，他们是打击我的。我有毛病³。文革后，我的意见发表出来后，与罗三人相同，这是客观存在。没有任何勾结。选文革⁴，我没投罗的票，文革选出后，我是支持了文革的。我要负责。

破坏大联合⁵，有一张大字报，《到底谁在破坏大联合？》，是我参加写的。

12·4⁶之后，文联 12·4 调查组写的传单、大字报，我参加写的，至于罗等什么活动，我不知。

罗等最后几天⁷，活动频繁。杨益言的很多观点，我是同意的。

吕亮：⁸

郭清⁹：

与刘德彬一起走¹⁰，搞什么鬼？

¹张惊秋，到过延安的老干部，曾任西南文联秘书长，《西南文艺》副主编，后因生活作风问题受过处分。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市文联专业作家，笔名殷白。罗广斌等在文联夺权后追随罗等造反。

²指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在小说《红岩》出版后被市委安排调到重庆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继续进行《红岩》“前续”的创作。

³指张惊秋因“生活作风”问题多次在中共党内受到批评处分。

⁴指罗广斌发起的选举重庆市文联文革小组，是在工作组撤离并遭批判后以罗广斌为首的文联造反派的夺权行动。这一所谓的“巴黎公社式选举”，剥夺了被定为“黑帮”、“黑帮爪牙”及“摘帽右派”共 8 人（约占文联机关在编人数三分之一）的选举权，选出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和炊事员郭清、厨房临时帮工尤淑芬五人组成的所谓“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文联文革小组。

⁵指重庆造反派因夺权问题分裂后，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了大联合，八一五派指责罗广斌是破坏大联合的罪魁祸首、“山城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⁶指 1966 年 12 月 4 日发生在重庆市体育场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当时由保守派的重庆工人纠察队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被造反派认定是“假批判真包庇”，前去冲击会场造反，引起大规模流血冲突。事后传出有造反派被打死的谣言。罗广斌积极主张抓住死人问题做文章，在重庆市文联最先召开了“烈士追悼会”，发表了声明。

⁷指罗广斌被抓走之前几天。

⁸原记录此处空白。吕亮是重庆市文联党组成员，老干部，专业作家，因多年无作品发表，是文联唯一无“毒草”辫子可抓的作家，成为工作组依靠对象。工作组撤走后，受到罗广斌为首的造反派排斥，另外建立了只有四个人的“尖兵战斗队”。罗广斌死后，“尖兵”为八一五派收编。吕亮后任文联斗批改组组长。

⁹郭清，重庆市文联炊事员，因其“工人”身份被罗广斌推举为文联红卫兵战斗组负责人和文联文革小组组长，实际一切均由罗广斌操控。

¹⁰指罗广斌被抓走后，刘德彬为反击八一五派有关罗广斌历史问题的攻击，带张惊秋一起去涪陵找曾于 1949 年“11·27”大屠杀之夜与罗广斌一起从白公馆看守所逃出的杨其昌（文革爆发时任涪陵专员）了解出狱情况，搜集旁证材料为罗广斌辩护。

徐靖¹：

张与罗三家村是政治上的勾结。罗上台后，张对罗特别亲。看罗眼色办事。
张说：“我就是要保张惊秋²。”公开说：“罗广斌是好人，是好人我就要保。”

美协吕琳³：

罗认为正威⁴是好同志，罗北京回渝⁵后，要正威上台，夺权。张对这会议很卖力。并诬蔑美协群众的会“要垮台”。（杨世元⁶插话：张回文联后，说美协的群众发动不起来，并在会上公开驳吕琳的“谁给正威平反谁倒霉”。）

张说：“罗是一个好同志，是文革中的左派，是山城第一个向黑市委开炮的。”
“他的历史是审查过的。”我说罗有野心，张说“没有”，“罗是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说“815是罗培养出来的”。张说“815的大方向错了，是有野心的，造反军是正确的”，因“罗到造反军去了三次”。

孙士平⁷：

刘德彬走前几天，说“工人可参加造反军”。刘和张到涪陵，叫我和××、××到党校去，找罗的旁证材料。刘说另外一些人到农村去，比较安全些。

九日我到造反军总部。

6日晚，我先和杨甦⁸、杨山⁹在杨甦家里商量，我说：“我们处的情况，很被动。我们是否到工厂去，给工人服务。”他们很同意。我想，罗问题出来，问题很大，原来我们是跟着罗走的。现在不能再跟罗跑了，到工厂去为工人服务。

5日，我和杨甦到过造反军总部¹⁰，看造反军总部对罗的态度。我出的主意，杨甦同意。找编报的，《重庆日报》的张怀祯，没找到。

一个月之前，叫给造反军总部编报，我去过造反军总部

¹ 徐靖，重庆市文联编辑部工作人员，诗人雁翼之妻。曾被工作组作为依靠对象。工作组撤走后，因被查出有“历史问题”，曾被罗广斌为首的造反派抄家批斗。罗广斌被抓后，成为批罗积极分子，与吕亮一起组建了“尖兵战斗队”。其夫雁翼（四川省文联专业作家，重庆市文联“代管干部”）则积极支持了“工农兵”到文联夺权。

² 此处明显是口误或记录者笔误，应为“我就是要保罗广斌”。

³ 吕琳，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版画家，老干部，“摘帽右派”。因与美协领导人李少言等素有矛盾，文革中李少言被作为“黑帮黑线”“走资派”批判后，他就成为造反派。

⁴ 正威，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版画家，小说《红岩》插图作者之一。文革初期被批斗隔离审查，罗广斌造反后为其翻案，并视其为美协主要造反派。

⁵ 1966年重庆“一二·四”事件后，罗广斌率重庆“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到北京向中央控告重庆市委操纵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制造流血惨案。1967年1月11日罗回到重庆。

⁶ 杨世元，重庆市文联业务组组长，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因曾调《重庆日报》办副刊，文革初期《重庆日报》副刊被作为“三家村”批判后成为审查对象。罗广斌为首的造反派在文联夺权后仍被当作“黑帮爪牙”监督劳动。罗广斌被抓走、“工农兵”进驻文联夺权后才得到“解放”，成为批罗积极分子。

⁷ 孙士平，重庆市文联业务组干部。追随罗广斌的造反派。

⁸ 杨甦，本名杨更生，重庆市文联编辑。追随罗广斌的造反派。

⁹ 杨山，重庆市文联业务组干部，编辑，诗人。追随罗广斌的造反派。

¹⁰ 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当时设于重庆市总工会内，离重庆市文联很近。

龚联建¹：

批《草地炊烟》²。

杨世元：

……年年都搞男女关系，文革中连续搞男女关系。……（举例略）并写反动诗“苦斗十年未翻身”。

56年，张被斗争，包庇章伯钧等人。当时主编《西南文艺》，发了不少大毒草。十年来，年年出事情，年年出反党毒草。张说：“我不能承认政治上蜕化变质，承认了，我就就要退出历史舞台。”（照读记录，1962年记录。）

郭福田³：

张在罗上台后说：“在文革中，对人要重新对待。”

发很多反党议论。

吕亮：

张提出：怀疑一切，但对罗不能怀疑。

郭福田：

张追随罗，直到追随刘德彬一起逃跑。张并为罗转移材料。

美协吕琳：

任白戈⁴和李少言⁵的关系，是张惊秋牵的。林默涵⁶与张惊秋是老朋友。把周扬黑帮牵到重庆王觉⁷。（王交代：林到渝来问过张惊秋。罗到北京回来后，带信说，林问王“张惊秋怎么样”。）

张惊秋：

¹ 龚联建，重庆消防器材厂工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业余话剧团演员，中共党员。曾愤于“一二·四”事件后罗广斌等人有关所谓“惨案”的宣传及“尸体展览”等作法而与重庆市曲艺团评书演员徐勍一起自费上京向中央控告罗广斌“破坏山城文化大革命”。此时是四川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重庆团负责人之一。

² 《草地炊烟》，张惊秋所写歌颂红军的散文，署名殷白，载1961年12月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期。在工作组主持文联批毒草时曾被徐靖批判为“咒骂长征，歪曲长征伟大意义，诬蔑红军长征中供给无力，影射三年灾害。攻击主席思想”等。工作组被批判后，这篇作品仍被造反派视为“毒草”。

³ 郭福田，重庆市文联人事干部。“尖兵战斗队”成员。

⁴ 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已经被作为“黑帮”批判审查。

⁵ 李少言，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主席，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文革初期曾任重庆市文化系统工作组组长。这时已经被作为“黑线人物”、“走资派”批判审查。

⁶ 林默涵，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已经作为“黑帮”批判审查。

⁷ 王觉，重庆市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已经作为“黑线人物”、“走资派”批判审查。

21年前与林【默涵】一起工作。但十几年来没与他们黑帮等联系过。没有问题。郭小川来渝，问过我。

去涪陵三天，回渝后，9日中午与刘【德彬】在小十字给华师¹【同学】打电话，刘打的，刘说文联已经乱了。后就到造反军总部，到杨益言在那里（5日）住过的一间屋子。是总工会给的。那天碰到老董²，老董讲了机关的情形，说很多人被斗了。后来郭清也来了。我就去洗澡了。之后，我就到重庆日报社了。住了几天，进进出出有人可以作证。

美协工人：

张到美协给工人做工作，宣扬罗和正威，谈黑电文³。最后一次，张同北大二女（朱、侯）同学⁴，给美协干部谈，企图拉美协干部跟罗一道，杨【益言】、罗【广斌】到美协作报告，张在后面作工作（所谓发动群众）。

阿鸽⁵：

张惊秋，要拉我们（到北京一月份回来后）到文联来，拉入他们的圈套。

张惊秋：

【当时是去】了解阿鸽等人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

徐勃⁶：

你转移材料，从档案拿走什么？

岳克⁷：

2月5日，罗被抓后，在华师【同学住处】研究黑电文⁸，是侯【均初】起草

¹ 指当时来重庆串联住重庆市文联的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学生。

² 董孝富，重庆市文联小车司机，因追随罗广斌造反而在“工农兵”进驻文联后遭到批斗，还曾被扭送公安局看守所关押。

³ 黑电文，指反对革联会一派群众组织《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急电》，称革联会的成立不是真正的夺权，而是假夺权，不是造反派的大联合而是分裂，让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流产。因电讯部门控制在八一五派手里，此电文未能发出，于1967年2月9日刊登在《首都红卫兵》报重庆版创刊号上。在2月1日研究通过电文时，罗广斌代表重庆市文联红卫兵战斗组签了字。

⁴ 当时北京大学朱学文、侯均初（已被打成“黑帮”的历史学家侯外庐之女）、李景屏、韩敏中四个女同学因慕小说《红岩》之名到重庆串联，住在重庆市文联，支持罗广斌等人造反，成为罗在造反活动中的助手。

⁵ 阿鸽，女，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版画家。

⁶ 徐勃，重庆市曲艺团评书演员，文革前曾因讲新评书《红岩》走红山城。1966年“一二·四”事件后愤于罗广斌等人对所谓“惨案”的宣传及“尸体展览”等作法而自费上京向中央控告罗广斌“破坏山城文化大革命”。此时也参加了“工农兵”的活动。

⁷ 岳克，重庆市文联编辑，诗人，笔名杨大矛。工作组领导运动时期，其文革前发表的作品曾被罗广斌当作“毒草”批判。罗广斌在文联夺权后，追随罗等人造反。

⁸ 指向中央文革报告罗广斌被抓走的电文。

的。怕打不出去，就又挂个电话（没接通），电报，叫我和张到造反军总部去找杨益言。把电报发出，并争取总部支持。杨写的《严正声明》。造反军对罗不表态度。只叫工人来看情况。见了车子（柯尔），估计有行动。

第二次去，在造反军吃晚饭，有……三司同学，正威的老婆李小君，研究，杨【益言】到贵阳去，刘【德彬】也走。抛弃家里的东西，有钱造雄¹的材料等。叫张惊秋谈的。

材料是刘德彬拿的，我拿的是两件大衣、被子，和桌子上的几封信。杨说被子给华师【同学】。这是5号那天。

815 美术革命造反队 8人（其中3个工人）

（阿鸽）

1. 罗——正威——造反军的关系。
2. 李少言←（张惊秋）→任白戈的关系。
也就有罗与黑市委的关系。
3. 罗——如何支持正威搞反夺权，破坏大联合的。

正威在保牛文²，叫牛文出来亮相。叫牛【文】写的材料只能交给正威。牛文就威胁李焕民³、吴凡⁴。吴凡写出大字报，说“正威是好同志”。

罗保傅文淑⁵。

牛文写了“黑市委如何要把罗打成反革命”。

1967.3.7 上午小会议室 继续揭罗氏三家村张惊秋的问题

杨山：

1. 关于张惊秋的问题。
拥护“工农兵”对张的处理⁶。

运动初期我对张有看法。张品质恶劣，蜕化变质，我给张贴了大字报，提了他的问题。张在生活上这样，在政治上，文艺思想上也是这样，蜕化变质。如在

¹ 钱造雄，重庆市歌舞剧团演员，曾任市委驻文联工作组成员，工作组时期的会议记录多为其所记。

² 牛文，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重庆市文联党组成员，小说《红岩》插图作者之一。曾任市委驻文联工作组组长。

³ 李焕民，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版画家，小说《红岩》插图作者之一。

⁴ 吴凡，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办公室主任，版画家，小说《红岩》插图作者之一。其国际上获奖的作品《蒲公英》在文革中被批判为“大毒草”，愤而自杀未遂。

⁵ 傅文淑，女，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版画家，吴凡之妻。曾任市委驻文联工作组成员。

⁶ 当时“工农兵”将张惊秋定为“蜕化变质分子”，罚其与“黑帮”和“摘帽右派”一起在“劳动组”监督劳动。

《草地炊烟》这作品，在检查刊物¹时就定了是“三反作品”，其中写的老红军是赵宏刚（当权派），这人到底怎么样，这是个问题。

【罗氏】“三家村”执政后，张打着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号，“造反”了。张恐怕是在大树底下遮荫，或者他本人也有着不可告人的野心。或与罗等臭味相投。

值得注意的是，张跟刘德彬走后，究竟商量过什么，搞了些什么，应叫他老老实实交代。

还有那次跟歌舞团宣传队 65 年到木洞深入生活，在丰盛，叫他与工农结合搞创作，而他要跑到长寿去，用访问的方式来代替创作（写了交流会），不愿写四清中的阶级斗争，在青木关也是这样。他说“访问很有道理”，并将访问形成一种理论，与毛主席文艺方针唱反调。

陈淑贞²：

完全拥护“工农兵”对张惊秋的处理。应对这些人专政。对张，不仅叫他劳动，而应对他的级别进行处理。杨世元写出张的第一张大字报，牛文为首的工作组就将张保下。

罗氏三家村利用了群众要挖文联内部的定时炸弹的情绪，打着见世面、经风雨的幌子蒙蔽群众。

选文革时，我只选了杨益言。我怀疑罗、刘³，之后我问罗的问题，有人说“罗没问题，在写《红岩》时已审查了”。后文件只送给杨、刘，就又对罗怀疑了。

罗给红卫兵讲话时说：“我在灯柜里发现一张反动标语，我是少数派，有些怕，就烧了。”学生问是什么标语，罗说是“打倒共产党”。

罗说：“李敬原当时是叛变了⁴，出卖了江姐。后改成甫志高，区一级的书记叛变了。”并说：“我也是上级叛变了，出卖了我。”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

罗叫我为学生放录音⁵，我是病号，又不会放，他们就要我现学。刘序椒⁶放上半天，我放下半天。放录音时，有些学生问我的很多问题，我都没法回答。

¹ 指工作组进驻文联后指定了杨山、徐靖、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等按照批判“文艺黑线”的精神分别检查由文联主办、在《重庆日报》副刊版刊出的《奔腾》文学双周刊从 1961 年底创刊到 1962 年间发表的作品的情况。

² 陈淑贞，女，重庆市文联会计。

³ 文革以前，罗广斌因 1949 年的出狱问题（到底是“逃出”还是“放出”）曾受到多次审查，刘德彬因在任教育工会主席时曾于 1958 年被定为“严重右倾”，撤职下放劳动，并取消了参加小说《红岩》的后期创作和在小说出版时署名的权利。

⁴ 李敬原是小说《红岩》中的重庆地下党领导人。罗广斌此处所指的是历史上的重庆地下党领导人刘国定、冉益智都叛变了。

⁵ 当时因慕小说《红岩》之名前来重庆市文联拜访罗广斌并要求报告当年狱中斗争和《红岩》写作情况的学生络绎不绝，罗广斌无法每天都给他们作报告，有时就叫放他的报告录音。

⁶ 刘序椒，女，重庆市文联财务出纳。追随罗广斌的造反派。

杨益言、刘德彬，在罗被抓后，杨说：“他们是想搞垮文联的。”又说：“是真正的革命派，就不会到文联捣蛋。”

文革¹一成立，罗就要岳林²“保证人身安全”。

杨【益言】说：“搞业务的参加文艺界造反司令部，行政参加机关造反司令部。”

杨还说：“815 不联合工人，只是学生参加。”³

杨在机关说过：“市委的权，最有权力接管的是文联、工会、妇联、青年团、党校。”

文联孤立⁴，我问杨是什么原因，杨说：“是新的反扑。”

杨、刘走⁵前说：“外面写的材料，是似是而非的。我们写的那些材料，先不忙发出去，等我们走了再发。”又说：“你们在这里没问题，是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1 月 11 日⁶，一天机关来了很多人开会，一个三司的穿着军衣，提了个录音机来，开了大会，他来借录音带，六点时候来借，晚 8 点我来准备收录音带，会议没开完。据杨益言说，是开的联合会，声明没搞成，破坏了。

第二天，体委来要话筒，我找杨，杨说三司【同学】拿去了。杨还批评我。后杨叫董孝富到三司去把话筒拿回还了。三带胶带没拿回。到 1 月 17 日，三司【同学】还来了三带录音带，我收了就交给刘序椒，刘交给罗泽惠⁷了。罗交给了“工农兵”。共 17 带（三大，11 个小，老董有两个小的并成一大盘，是录的“红灯记”——是北大李景萍、侯均初唱的。）

向晓⁸：

杨【益言】说：“有几件群众证明烈士的文件，遭 815 拿起走了。”

陈淑贞：

长安厂余祖胜⁹的弟弟余祖强（瞎子）来文联找罗三人，罗三人不敢会他。余问是否准备在 11·27¹⁰开一个大会。（余祖胜与杨认得。）

¹ 指文联文革小组。

² 岳林，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

³ 这是当时反对革联会一派的说法。其实他们所说的八一五不联合的工人只是指工人造反军等组织，而实际上当时产业工人中的主要造反派组织如军工系统的八一兵团、重钢的九八战斗团等都参加了联合夺权并派代表担任了革联会常委。

⁴ 指罗广斌等站到反革联会一边后遭到许多八一五派组织攻击。

⁵ 罗广斌被抓后，杨益言、刘德彬先后逃到贵阳，得知罗广斌死讯后又到北京向中央告状。

⁶ 1967 年 1 月 11 日，罗广斌从北京返回重庆，当天即在重庆市文联召开了部分群众组织头头小范围的会议，传达其“向中央首长汇报”的情况和北京见闻。后被八一五派称为“小联合黑会”。

⁷ 据杨世元回忆，罗泽惠不是文联机关编制人员，好像是工作组时期从外单位借调来的打字员。

⁸ 向晓，重庆市文联《奔腾》副主编，曾任文联文革办公室主任。

⁹ 余祖胜，原国民党渣滓洞看守所殉难烈士。

¹⁰ 1949 年 11 月 27 日，国民党当局逃离重庆前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看守所的政治犯（包括中共及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国民党军统局违纪人员等）实行大屠杀。以后重庆市将每年的这天定为烈士殉难日。

许建业¹的侄儿（达县步行串联来）找罗，罗也不见他。

罗在录音中说：“我入党，是江姐和刘国鋐的介绍人。”“杨益言当时不是党员。杨是解放后入的党。”

杨对我说：“罗那时不是党员，是进步青年。”

罗被抓后，一天上午，杨【益言】、刘【德彬】在小会议室说：“江姐在联大工作过。那时罗与江姐就认识。罗到监狱后，监狱里的同志还如何考验他，叫罗睡尿桶边。”

杨山：

关于罗三人。

凡是红卫兵来问他们历史的，他们就不高兴。

在重钢罗被扣那天，造反军当时拿了个条子来文联，小会议室，条子（三十二开大小）上写了：“合川工人纠察队的队长写给合川农工的信，罗广斌叛徒已被活捉住了。”华师【同学】说：“这条子很重要。”并照了相。北大的小吴（吴泽湘），新北大文革战斗组。

江日²来找过我，拿一封信来，是雁翼³给江日写的一封信，信是给杨益言了。信中说：“有很多情况，龚联建很清楚，希你和龚谈一下。”之后，把信交给刘序椒收藏了。

江日来时，北航已写出“很像一个定时炸弹”⁴，江【日】说“龚【联建】是工人纠察队。龚、徐【劬】搞罗的材料问题”，那封信上写得有“工农兵夺权的问题”，是杨益言叫我接待的。杨说：“龚是否工纠啊？要调查一下。”

这封信，在“冲天笑”寄来的大字报之后，是“五尺枪”寄来的。

关于机关的材料问题：

北航来了之后，怕材料被弄起走了，（材料包括工作组、杨世元揭罗，罗等到市委去拿来的简报等，还有王觉、邓均吾⁵的材料……材料放在罗泽惠处。）

刘德彬说：“这些材料很重要，不能被弄走，要捡好。”“罗泽惠清一下，交给刘序椒处理。”材料是刘序椒拿出来，在小会议室叫大家看，我看了材料，孙士平看了。看了又交给我了。

罗泽惠保管的材料是雁翼的东西。

¹ 许建业，原中共重庆市委委员，1948年被捕后遭国民党当局杀害，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

² 江日，重庆市第六中学教师，业余诗人。

³ 雁翼，四川省文联诗人，家在重庆市文联。因其妻徐靖曾被罗广斌为首的重庆市文联造反派抄家批斗，雁翼暗中支持“工农兵”进驻文联夺权。

⁴ 1967年1月31日晚，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以大字报和传单向重庆全市宣称《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开始公开点名批判罗广斌。

⁵ 邓均吾，重庆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奔腾》文学双周刊主编，老诗人。已经被工作组上报市委内定为要打倒的“黑帮”。罗广斌为首的文联造反派执政后仍然将其作为“黑帮”批判和监督劳动。

熊小凡¹：

雁翼被抄家²后，【抄】的材料放在罗泽惠的屋里。叫罗泽惠、刘序椒、熊小凡清理。雁翼的日记本，是罗泽惠叫我拿到华师【同学】楼上去的。是七日，华师【同学】准备搬到大屋去。

杨山：

材料有些东西是交给华师【同学】的，是听刘序椒谈的。

估计，刘序椒拿出叫我们看的那一包，没有什么价值。

（材料中有：文联工作组的简报，工作组大事记，人头材料，综合材料，排队材料³，王觉、邓均吾的材料，马戎⁴、向晓、继楼⁵、杨世元等的检举材料，）这包材料，据我知，以前是放在刘序椒私人寝室的。现在刘处否，不知。

赖⁶：

2月9日11点，段上红色娘子军⁷王口梅来抱的，刘金祥，孙士平的老婆把她送出去的，黄纸包的。

老董拿到家，由刘金祥接送出去的。

杨山：

刘德彬说过：“一个工人组织来了个人，问罗广斌，凑七星岗一个家属揭露罗的情况。”刘说：“这是强迫人家写的，鼓着⁸盖的手印。”刘又说：“那个工厂的娃儿，写罗的材料，也是鼓着干的。”

刘说：“这是黑市委有计划整的，强迫整的。”

又：电报，先是侯均初写，刘德彬看后，改了几个字，是罗被抓后，给中央文革的电报，刘德彬说：“现在电报、电话都掌握在815手上，打不出去。”

刘德彬有个“蔡斯”相机给刘序椒。

我问刘序椒材料下落，她说：“我都交给学生了。”

¹ 熊小凡，重庆市文联编辑。工作组领导运动时期其文革前发表的作品曾被罗广斌批判为“反党”。罗广斌为首的造反派夺权后追随罗等造反。

² 罗广斌等在文联夺权后，因查出雁翼夫人徐靖有“历史问题”，对其进行了抄家。雁翼实际上长住成都。

³ 指当时各单位党委或工作组对全体人员进行“政治排队”的材料，按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批判教育对象、打击对象分为四类。

⁴ 马戎，重庆市文联编辑部主任，《奔腾》副主编。

⁵ 张继楼，重庆市文联党支部书记、《奔腾》副主编，儿童文学作家。

⁶ 重庆市文联门房。追随罗广斌的造反派。

⁷ 这里所说的“红色娘子军”，是重庆市文联追随罗广斌的职工家属妇女与同一街道地段（社区）的一些妇女成立的造反派组织。在罗广斌死后被作为“保罗组织”勒令解散。

⁸ 或写作“牯着”，川语，逼着、强迫之意。

罗、杨到西师 831 回来之后，说：“重大很右很右，在整风会上，工纠都发了言，把我们安排在 17 名，到晚上才发得到言。我们就提出了抗议，下面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我们，一派叫我们滚。”杨还说：“一派把话筒拿走，一派又把话筒拿到罗面前。”¹

尽管他们说：“我们还是把重大 815 看作内部矛盾，还是苦口婆心的帮助他们。”可是实际上却是打击 815 的。

1967. 3. 7 下午小会议室

岳克：

“工农兵”、815 要我写个材料，写与【罗氏】“三家村”的关系。

1. 与罗等的关系。

运动前没有任何关系，对其问题不了解。

运动中，李少言传达，没叫罗三人参加，我没有任何怀疑。认为他们开会去了。

赶工作组前，一次看大字报《赞少数》，他对我说：“要么四类，要么一类，应排得靠前点。”

以前没听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12·4 以后，有怀疑，罗等【对攻击他的】传单、大字报，开始不回答。问多了，杨【益言】说：“罗是好同志，在狱中戴着脚镣跳舞，为打篮球，球衣上罗刺绣的‘自由’英文缩写。罗与陈然同一牢房，陈教育了看守，现在河南。刘【德彬】说：“谅他们拿不出任何钢鞭材料。”

罗个人突出，录音讲话和报告中，讲《红岩》，谈自己。

给红卫兵签字²。

【吹嘘】到北京去向周总理汇报四次。

搞神秘主义。来访者很多，罗单独接见时，不要其他接待组人员参加。1. 11 在文联开了一天会（小联合黑会）。

杨【益言】说，要写【反击的】稿子，并出了几个题目。

攻击重大 815。一次元月 31 日夜晚，杨【益言】与朱学文回来，他们说，³关于红色恐怖⁴，罗、杨从西师回来说：

¹ 当年四川涪陵（今属重庆市）一位高中三年级学生（网名“老巨 333”）在网络连载的《亲历亲闻——我的“文革”》（43）：旁观“开门整风”中回忆：1967 年 1 月 21 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在学校风雨操场召开“开门整风”大会，提意见者排队轮流上台发言。罗广斌、杨益言也去了，当一个重大工人（保守派工人纠察队成员）上台讲了很长的话，提了些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后，罗广斌不依次序上台抢话筒发言，批评这种“让保皇派放毒”的作法是“敌我不分”，“太右了”，被重大八一五学生轰了下来。

² 当时很多到重庆串联的学生都是小说《红岩》的“粉丝”，都要到文联来见罗广斌并要其在自己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签字留念。

³ 原记录写到此处中断。

⁴ 罗广斌 1967 年 1 月 11 日从北京回到重庆后，曾在重庆市文联宣布造反派要实行红色恐怖，并由驻文联

当时决定：一、无论职工家属，一律退出保字号组织，二、勒令保字号组织交出笔记本，三……四、【发】通告。刘德彬叫我起草通告。

罗极力为正威平反，说正威 64 年就向中央写过报告，告李少言。

罗说：“美协只有东方红是真造反，其中有阿鸽、徐匡¹等人。”

李南力²，对写九三事件的大字报，写得最多。

罗等准备给温田丰³选举权的⁴。

罗与【文联】文革关系。

1. 西师夺了印刷厂后，帮文联印了五千份大字报选。

罗又叫我编了三集文联大字报选。是 11.26 送去的，顺便带去。正威写的《美协是个大黑店》和另一材料，到西师去是董孝富、刘序椒和我，罗写了条子，叫我羊衍海⁵，831 总部负责人。

11.26 西师借给文联录音机一部。

罗说：“西师 831 很坚强。”

杨【益言】在妇联打外仗，与 831 有联系⁶。

羊衍海来找过杨。

2. 说黄廉⁷很坚定，要揭廖志高⁸。

12·4 后很紧张，杨【益言】说，造反军有几百人保护。

杨【益言】叫为造反军编报，罗说：“这事当黄廉回来再决定。”

罗在重钢被扣，是侯均初给刘德彬打回的电话。刘叫到团市委找西师 831，没找到，就到造反军总部，也没人。

2 月 5 日罗被抓后，下午在华师【同学住处】楼上开会，侯【均初】起草给中央文革电报。文联有我，杨山，张惊秋，刘德彬后来。电话是我挂的，没挂通。电报，叫一司、三司【同学】发出。

红卫兵将全体“黑帮”与“黑帮爪牙”都抓到文联礼堂里下跪“向毛主席请罪”。

¹ 徐匡，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版画家，小说《红岩》插图作者之一。

² 李南力，1921 年生，四川南充（今属重庆）人。大学毕业。1939 年赴延安，曾任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员、鲁迅艺术学院学员，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编辑，豫西日报社及新华社第二野战军分社编辑、随军记者、采访科长，1949 年后历任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创作员，战士文化读物社副社长兼总编辑，转业到地方后任四川省作家协会秘书长、党组书记，重庆作协分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主任、重庆市文联党支部书记、《红岩》副主编。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市文联专业作家，“摘帽右派”。1970 年被迫害致死。

³ 温田丰，原名温嗣祥，回族，重庆人，三十年代初主编重庆《商务日报》副刊，参与组建重庆救国会。曾赴延安并三次采访毛泽东，并由毛泽东批示给罗瑞卿介绍其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重庆市文联秘书长，《说古唱今》副主张。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峨边劳改。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市文联业务组工作人员，“摘帽右派”。

⁴ 指选举文联文革小组时，罗广斌为首的造反派剥夺了所谓“黑帮”、“黑帮爪牙”和“摘帽右派”共八人的选举权。

⁵ 羊衍海，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六七级学生，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负责人。

⁶ 1967 年 1 月 19 日，西师八三一负责人岳朝亮率校外战斗队到文联，由杨益言带领进驻团市委、市妇联大院，杨介绍了院内机构及住户情况，提供了需要“抢黑材料”的抄家名单。

⁷ 黄廉，重庆木材公司鱼鳅浩木材站采购员，时为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主要负责人。

⁸ 廖志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熊小凡：

张惊秋宣传：“对党是有感情的。”对他的处理不服。

九、十月份，罗说：我们现在¹

1967.3.8 下午 1：00——4：00

文联工人揭罗氏三家村

郭清：

文联文革产生后不久，罗到处点火。十一月初，歌舞团成立革命组织，欢迎罗讲话，罗大讲其一、二封信²，还把我的名点出来说：“我们文革的负责人是工人郭清，他领导我。”后歌舞团把我弄来站高点，并叫到主席台上。那次罗约我们到小竹林吃饭，我吃了他三两饭。

罗说：“你们工人都可到北京去。”

川剧二团对杨【益言】有意见，川剧团给杨写了一张大字报来。川剧团有人说《老狐狸的故事》³是杨写的，一天晚上，杨叫小车子把我们工人弄去为杨辩论这事。

张巧凤、许倩云⁴，在罗氏文革开张过后，经常来，曾经与罗的关系密切得很，天天来。胡漱芳⁵也经常来。

黄自强来文联，是文联一冲破就来找罗，曾在这里歇几晚上（两三天），住三司【同学】屋里（吃饭都不下楼）。那时朱学文也说黄没啥问题。黄在十二月份（罗北京回渝）都来了一次。

元月 8、9 事件，黄廉在文联住过的。杨说：“我给他想个办法。”

那天有人找杨益言，给杨写了个条子：

“昨晚想的对策，一晚上插不上手。请黄另想办法。造反军分部 1.9”

研究电报，有杨甦、岳克、孙士平、刘德彬、杨益言、张惊秋。电报内容是为罗翻案。采取措施走，贵阳去打【电报】。

逃走前，杨与造反军的人在工会商量，老董说，要坐汽车去。造反军派两个

¹ 原记录到此中断。

² 指罗广斌、杨益言于 1966 年 10 月 23、28 日先后写出的两封“致文联机关全体革命同志的信”，宣称他们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公开表明向市委造反的立场。

³ 《老狐狸的故事》是文革前发表在重庆市文联主办的《奔腾》文学双周刊上的业余作者写的童话故事。文革中罗广斌在向外地来渝串联红卫兵报告“重庆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史”时，经常举例说这篇童话故事是影射攻击毛主席的大毒草。

⁴ 都是当时川剧团的名演员。

⁵ 胡漱芳，川剧名演员，民国时期人称“川胡蝶”，中共执政后改嫁的丈夫曹开与罗广斌原是地下党时期战友，此时是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干部。胡漱芳在工作组领导运动时期曾因“历史问题”和“文艺黑线问题”遭批判，罗广斌起来造反后力主为其平反。

司机。走有“侯子”。

老董 2.9 说：“昨晚上我就是没睡着，就是为这手巾。”包的公章，说是交到我手上。下午我去买香肠，顺便到造反军总部去看看他们干什么，在楼梯口碰见老董，碰见华师的司机（年青的，圆脸），抱了一包东西，给老董，并说：“交给你了，我们不负责了。”之后，刘德彬回来，董将一包东西和公章交给了刘。刘放在抽屉里了。之后，我约董到老高那去耍一下（高是肉制品公司的），回文联后，董对我说：“我还要转去把东西拿走，转移走。”听他说，他抱到许嫂子那里去了的。

包包是司机衣服包的，有档案袋大小。

那天（2.9）晚上，董没回来，第二天，他说：“在街上转了一晚上。”又说：“糟了，公章遭砸时拿走了。”我问材料呢，他说材料转移走了。

2.11 晚上，老董，及【他】婆娘，华师【同学】，把造反军【的人】带进来，到我家打门，多凶的说：“你还夺不夺权嘛，快下去弄饭！”

两三天后，“工农兵”斗了董。董在菜市场找到我，说：“我坚决不回去了。”直到现在没回来。我没与他联系。

自那晚以后，董的老婆晚上不回来。白天才回家。家里只有娃几个人睡。

最近不久，听说老董到教育局借车子。

碰到造反军张勇，我问：“你们在哪里？”他说：“在枇杷山。”

孙士平老婆刘金祥对我说：“我们成立个造反派，有我，孙士平，董孝富，你，尤淑芬参加。”刘曾为造反军写大字报，为罗很卖力。12·4 扎孝花¹很积极。写两张大字报就吆不了台²了。刘说：“我们娘子军，你要好多人有好多人。看他‘工农兵’。”（注：原记录到此为止，语意未完。）

【编读往来】

庄菁瑞谈李海文笔下的张春桥

一口气看完 65 期《昨天》。真是往事并不如烟！

关于张春桥的那篇《张春桥“家书”之外的另一面》，让我对这个人，对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中的相关历史人物都有了较为完整的立体的认识。

张春桥是人，所以才有人性的各种表现。他爱文静，无论她是什么身份干过什么事，他都爱她，为爱可以不顾“组织原则”、“革命立场”。他对家人、对情

¹ 1966 年“一二·四”事件发生当天，所谓保守派打死了造反派的谣言刚刚传出，罗广斌就在重庆市文联抢先召开了“烈士追悼会”。次日又给造反派在体育场召开的大会抬去了祭奠“烈士”的花圈。

² 吆不了台，川语，沾沾自喜、翘尾巴之意。

人的情感是人性闪光一面的自然流露。但同样一个人，对政敌，对威胁他自身和身边亲人爱人的“敌对势力”的那种残酷，完全不似人类，是人性中最最恶劣丑陋的阴暗面。同一个张春桥，身上既有善也有恶，这是复杂人性在一个人身上的自然表现，也是历史的真实。世间每一个人，只要是人，内心深处都会不可避免存在这相互对立的两面性，无一例外。这是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所以我们要面对，要坦然面对才能处理好历史人物研究中所遇到的相关问题。

正因为如此，研究张春桥，研究所有历史人物，都不该只看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各种不同角度的研究综合在一起，才能大致看清这个人物的本来面貌，进而看明白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历史条件下，荒谬甚至相互矛盾的行为轨迹。李海文的文章写得很好，她从选取与其家庭和经历相关的视角，弥补了《张春桥狱中家书》一书的不足和缺陷，尽可能地让读者，让全社会的人全方位地了解了张春桥这个历史人物的真面目。无论“张春桥到底是一个高蹈理想的殉道者，还是一个充满心机的实用主义者；是一个充满爱心的谆谆长者，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弄权政客”，他都是个人，是个和你我一样的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无需美化，也不要抹黑，还其本来面目就是了。这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极为需要的一项工作。

舒云、余汝信谈“直升飞机”与“直升机”

舒云来信指出，65期王锐文中提到军用直升机，但小标题上却写成“直升飞机”，这是不对的，正确说法应该是直升机而不是直升飞机。

余汝信来信具体说明：很多人误以为直升机是直升飞机的简称，其实，两者是不同的概念。直升机是规范用语，指的是垂直起降的飞行器，即平时所说的没有固定翼的旋翼机。中国自行生产的直升机有直5--直15等型号。直升飞机并非规范用语。飞机是有固定翼的，所谓直升飞机，规范用语应为垂直起降固定翼飞机。垂直起降固定翼战斗机中国目前尚在研制阶段（型号为歼18）。